

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碩士班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如魚得水」或「格格不入」？：
不同階級背景學生進入菁英大學的經驗探究
“Fish in the Water” or “Out of Place”？
Social Classes and Students’ Lives in an Elite
University

陳佑任

You-Ren Chen

指導教授：林昱瑄 博士

Advisor: Yuh-Suan Lin, Ph.D.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January 2022

中文摘要

過去研究在談論階級再製時，往往傾向預設階級不平等在世代之間的延續，較少嘗試從「階級作為生涯」的角度來思考個人繼承並打造階級的歷程，亦即：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例如，從小學到大學），不同背景的個人究竟會如何理解自身的處境、做出不同的抉擇？而這些抉擇又會帶來哪些的正向效應或非預期的代價，進而反過來影響個人對於自我的定位和理解？本研究嘗試探討不同背景學生從小到大的生涯差異，以便勾勒階級運作的複雜機制與過程。透過訪談七名不同階級（三名工人階級、四名中產階級）菁英大學生從小到大的成長經歷和求學歷程，本研究歸納出四種不同的教育軌跡，研究發現：

工人階級學生的教育翻身（亦即進入菁英大學）不是高度仰賴個人的努力和天賦，便是得依靠家庭強勢的介入來彌補自身先天條件的不足：採取個人化途徑的工人階級學生因為從小就靠自己長大，即便在大學面臨格格不入（例如，難以融入菁英社群、不知道如何應對制度規則）的困境，也往往具備較強的自尊和韌性；從小受父母強迫的工人階級學生則是傾向展現無力和侷限感，因為他們不但要承受原生家庭的劣勢，也欠缺自我培力的機會。與工人階級學生相比，中產階級學生的教育途徑平順得多，但教養風格（菁英教育 vs. 全人發展）的差異，也使他們對教育採取不同的態度：比起傳統菁英學生大多欠缺自我的想法，習慣聽從大人的意見，採取全人路線的學生不僅擁有更強的權利感，也更懂得運用自身的優勢。也是因為如此，在大學中，前者在欠缺父母引導的情況下，往往容易陷於焦慮和不安，跟不上多元化的學習步調跟節奏；後者則往往是如魚得水，擁有清楚的生涯目標和方向。

上述的發現說明了個人階級生涯的複雜性。雖然階級在結構層次的不公，依舊是形塑個人教育軌跡所不可忽視的因素，但成長經歷的差異，也可能會在個體的層次形成與原生家庭不一致的軌跡。

關鍵字：家庭與學校教育、資本、慣習、菁英大學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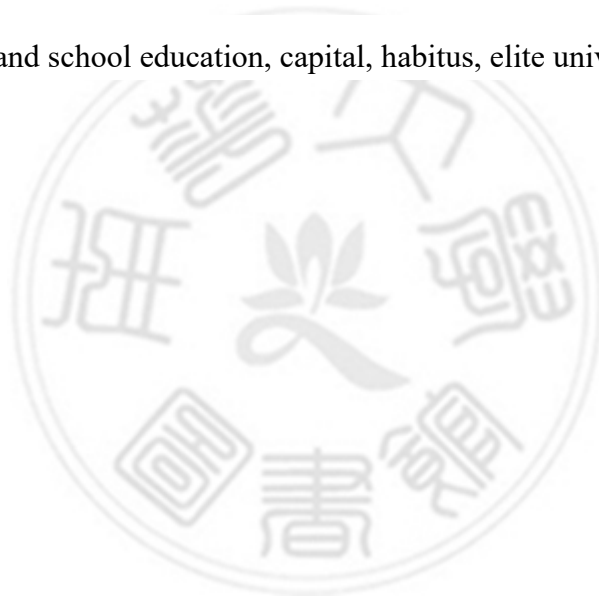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class reproduction tend to presume the continuation of class inequality across generations, but less often consider the process of inheriting and forging class from a "class as career" perspective, that is, how do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construe their situations and make different choic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e.g.,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college) ? What positive changes or unanticipated costs will these choices bring, which in turn affect the self-orien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s ?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areer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in order to outline the complex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of class functioning.

By interviewing seven elite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grew up in different classes (three from the working class and four from the middle class) to understand their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this study identified and summarized the following four different educational trajectories. The educational mobility (i.e., entry into an elite university) of working-class students is either highly dependent on individual effort and talent or relied on strong family involvement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innate deficiencies. Those working-class students who take an independent approach, growing up on their own, tend to have stronger self-esteem and resilience even when they face the predicament of not fitting in at university (e.g., difficulty being included into the elite group, not knowing how to deal with institutional rules). The working-class students, who are forced by their parents were tend to express sense of constraint, as they not only suffer from family disadvantages, but also lack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mselves under parental coercion. Compared with students from the working class, students from the middle class have a much smoother educational path. However, differences in parenting styles (elite education vs. holistic development) also lead to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education. Unlike traditional elite students who lack self-awareness and follow the advice of adults, students who take a holistic approach

not only have a stronger sense of entitlement, but also know how to utilize their strengths. Because of this, the former tend to be anxious and unsettled in college without parental guidance and fail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and rhythm of diversified learning, while the latter tend to feel confident and have a clear career goal and direction.

The above findings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how the social class affects an individual's career. While the structural inequality of class remains a factor in shaping an individual's educational trajectory, the differences in upbringing may also lead to a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that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social class of the famil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Keywords: 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 capital, habitus, elite university



目錄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目錄.....	IV
表目錄.....	VI
壹、前言.....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5
貳、文獻回顧.....	8
一、工人階級的教養和求學經驗.....	8
(一)、家庭與學校作為階級再製的場域.....	8
(二)、大學教育作為階級翻身的場域.....	10
二、中產階級的家庭教養和學校經驗.....	12
(一)、家庭與學校作為優勢傳承的場域.....	12
(二)、階級傳承的代價與不預期效果.....	14
三、回到台灣的脈絡：階級、升學與菁英教育.....	16
四、小節.....	18
參、研究方法.....	21
一、研究取徑.....	21
二、參與對象.....	21
三、訪談的進行方式.....	23
四、資料分析.....	24
肆、成為「菁英」：工人階級的進擊與反噬.....	26
一、順制度而生的倖存者.....	26
(一)、順其自然長大.....	26
(二)、制度化的天賦和自信.....	28
(三)、大學作為階級翻身的跳板？.....	29
二、雙重劣勢的屈從者.....	33
(一)、權威式的教養.....	33
(二)、建立與學習成就的關聯.....	35

(三)、大學，走下坡的開始.....	36
伍、再製優勢？中產階級的「典型」和「例外」.....	39
一、傳統典範的繼承人.....	39
(一)、形塑成功的樣板.....	39
(二)、學校教育作為家庭教育的延伸.....	41
(三)、上大學的意義.....	42
二、超越升學邏輯的自由人.....	44
(一)、培養獨立思考的自主態度.....	44
(二)、追求多元的教育經歷.....	45
(三)、歷經冒險的成長和回歸之路：.....	47
陸、討論與結論.....	51
一、研究發現：.....	51
二、理論反思：贏在起跑點就夠了？.....	54
三、研究限制：.....	55
柒、參考文獻.....	57
中文文獻：.....	57
國外文獻：.....	59
附錄：訪綱.....	64

表目錄

表 i、參與對象簡歷.....	22
表 ii、不同階級學生教育軌跡.....	51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從小是在中產階級的家庭長大，不僅在生活方面衣食無憂，而且也受到父母充分的支持和照顧。就社經地位而言，我的父母都擁有大學學歷，父親是醫生，母親則是從商，但以世代的觀點來看的話，他們就像上個世紀六零年代的許多人一樣，屬於成功代間流動的「第一代中產階級」：他們一開始都不是出身在富裕或專業階級的家庭，而是藉由後天的努力才有現今的成就。這樣的經驗，對他們在教育上的態度有很大的影響。從我小的時候，他們就非常重視我在學校的成績和教育，也認為我們這一代很幸福，擁有他們過去不曾擁有的資源。我的父親經常跟我說他過去參加大學聯考的經驗，「你阿嬤當時什麼都不管的，哪有空管你，你就是讀你自己的書」而不像現在，即便他每天工作在忙，也會抽空陪我背誦英文，並花錢讓我補習和買參考書。

父母什麼都給我「最好的」。在學習資源上總會買各種新穎的讀物，在家中擺滿各式的生物圖鑑、百科全書、英語實習教材，在課程方面，他們也幫我報名各種才藝班和夏令營，只要是他們可以負擔，他們都相當願意付出。但他們因為沒有時間，平時很少有空管我，即便家裡總是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教材和書，我也很少真正接觸和投入，不曾從中得到滿足和成就。儘管如此，我明白這是他們愛我的方式。提供好的資源，不僅是他們所熟悉的，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下一代的期望和投射。他們希望能透過這樣的付出提供我更好的未來和出路。而作為回報，我也很聽話，從小便維持著還不錯的成績，一直保持在正確的軌道上。

這樣的默契卻在進入國中之後開始產生變化。選擇國中時，我如爸媽所願，順利地申請上一間名聲不錯的私校。由於學校本身相當重視升學，同學之間非常競爭，我所隸屬的班級又是當年新設的資優專班，老師對待學生特別嚴厲。為了衝升學率，不僅班級之間每周每月都有競賽，在班上，老師也會根據平時成績的排名，將同學分門別類，賦予不同的權利（例如，成績好的組別可以優先選座位、吃午餐等）。在肅殺的氛圍下，我們被規定每天早上、中午和放學前都要進行段

考和測驗，即使當天不用被留校補考，回家也有做不完的作業等著要做。在求學的過程中，有些厲害的同學，因為排名的壓力被逼得陷入嚴重憂鬱，有些則是因為成績跟不上其他人，被周遭的人排擠和嘲笑。同學為了競爭，經常彼此互相猜忌和惡鬥，老師則為了升學率，對這些現象視而不見。

在那樣高壓的學習環境中我不禁開始動搖，也對一味地追求成績感到質疑和不解。我嘗試詢問爸媽，但他們沒能給我解答，只叫我：「你念好自己的書就夠了，別想那麼多。」我跑去詢問老師，老師卻告誡我不要學那些成績差的同學，只會整天找藉口和抱怨。這些「建言」就像現實狠狠把我甩了一巴掌，彷彿上學的目的只為了考試和競爭，沒有其他的意義。由於對學習感到無助和絕望，我開始變得愛玩，也不再專注於唸書。我從原本聽話的「乖乖牌」成為被老師瞧不起的「壞學生」。除了整天跟成績差的同學「混」，也時常翹課，進出學校的訓導室。自從我的成績直直落，老師對我的態度變得愈加惡劣，沒事就喜歡找我麻煩，把我視為拉低班上平均的「累贅」；同學也嫌我沒用，時常對我冷眼對待，拒絕跟我有牽扯。至於我的父母，他們雖然不曾嚴厲的責怪我，但也很少再跟我提起任何有關學校或成績的事。

這樣的求學經歷，使我在考大學的時候很沒自信。因為當時身邊的人，不論是老師或長輩都不斷向我們灌輸恐懼，告訴我們「你如果唸不好書，將來一定上不了好大學，做人也不會有出息」。就連身邊家境相當、從小一塊長大的朋友，也受到升學氛圍的影響，喜歡較勁彼此的表現。最後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當大學放榜的成績公布，我的朋友紛紛興高采烈，有的考上國立名校，有的進入理想的熱門科系，但我什麼都沒得選，慘淡的成績只錄取位處嘉義偏鄉的後段私立大學。

大學前的求學經驗，讓我深深體會到身為一名中產階級學生在主流菁英教育體系下的代價。在這個世界中，我們看似都一樣，但考試使我們分化，也判定了我們的生死，學生就像是為了複製成功故事所打造的傀儡，不得不為了追求分數而犧牲自我的幸福（Lucy & Reay, 2002）；分數決定了我們是好學生或壞學生，是值得被認真對待的繼承人，還是一無是處的失敗者，倘若沒能保持優異的成績，一不小心就會遭到淘汰，被打上羞恥、失格的烙印。這樣的經歷讓我不禁納悶，

明明我從小衣食無憂，但我為何一點都不快樂？我的父母說我很幸運，為何我對未來卻感到如此迷茫？那樣的矛盾使我常常懷疑自己，甚至在剛上大學時，一度覺得人生無望，對於未來感到恐懼。

然而，在後段私立大學唸書是一個特別的體驗。雖然同樣都是「受教育」，但大學完全不像國中高中，不僅課程多元，老師也相當友善。由於不必再為了考試而枯燥地學習，我很快便喜歡上大學的生活。但弔詭的是，我發現周遭很少有同學跟我一樣，因為獲得了這份「自由」而感到特別充實和快樂。我身邊的同學大多都是不愛上學的。每次上課的時候，教室不是空蕩蕩的，便是充滿了沉寂的氣氛。同學望著老師在台上滔滔不絕，臉上總是透露著茫然，顯得相當煩悶無聊。同學們大多都是來自家境不好的家庭，很少來自外地，或許也是因為如此，他們的生活相對單純。平時沒事時，喜歡窩在校園的角落抽菸，或者在宿舍附近遊蕩，尋求有趣新鮮的刺激。但對學業的要求，他們始終提不起勁，也無力思索自身的未來。隨著跟同學們相處的日子越長，我有點不知所措，從「他們」身上，我彷彿看到了過去的自己，但也是因為如此，我內心也帶著不安和焦慮，擔心自己會不會就「真的」跟「他們」一樣，對於自身的前途不再抱有期望，就這樣虛度大學的光陰。

為了尋找一條出路，我下定決心選擇「離開」。我切斷自己跟大家的聯繫，同時也在圖書館自修，大量旁聽外系的課，希望能藉此彌補我過去的空白。在那段期間，我也曾經數度轉系，嘗試接觸不同的領域。在升大四那一年，我正式申請進入社會學系就讀，那是我第一次清楚自己想追求什麼，也在那邊遇上了一群與我志同道合的夥伴。社會系的夥伴對我來說相當特別，因為他們是少數我在學校遇過對學習有熱情的學生。儘管出身弱勢，過去的成績也不好，但他們在面對各種生活困境時，反而能展現出「不服輸」的韌性和態度，使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們因為彼此的態度而相互吸引，甚至會以此為傲，把追求知識當作我們共同的志趣。在熱情的驅使下，我們不僅經常一塊修課，針對課堂所學進行交流和思辨，私底下，我們也舉辦各種活動（讀書會、社團）來聯絡感情，在心靈上相互支持和協助。這段友誼成為我自尊自信的來源，也讓我在大學的生活增添許多豐富的色彩。

可是，很快的我們就發現，無論我們再怎麼熟識彼此，擁有再多共同的革命情感，階級始終就像是一道隱形的牆，成為我們難以超越的障礙。每當我們越是深入了解彼此，便越發覺到彼此在出身方面的根本差異。就家庭背景而言，我無疑幸運得多。「全職學生」的身份賦予我充分的時間能專注唸書，不需要為了償還學貸而犧牲自我學習的步調和品質。一個人在外面住宿，也讓我不必為了省錢而有所妥協，必須在生活上迎合和依賴他人（與跟他人同住同吃，解決共同生活的問題）。原生家庭的穩定（沒有負債或複雜的親子關係）更是讓我能夠保持身為「學生」的完整自尊和認同，不會因為受到家裡「拖累」而被迫在理想和現實之間舉棋不定（例如有些人會因為家裡期望自己早點出社會工作，而打消念研究所的規劃）。雖然對我而言，享有像是大學生一般的自主和獨立，幾乎就像是呼吸一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對於我那些夥伴來說，卻仿佛像是不切實際的理想，充斥著協商的痛苦和代價。也是因為如此，每當跟他們相處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內心的矛盾和複雜情感。有些朋友會抱持著羨慕的心態，在看到我宿舍成堆的書籍之後，以像是陌生人般的口吻向我讚嘆道：「我真的沒想過有機會認識像你一樣的朋友」有些則是會心生妒忌，調侃我的生活怎麼可以過得如此悠閒。再更直接一點的，甚至會對我加以控訴，斷定我就是有錢有閒，所以才能保持不錯的成績（儘管他並沒有說錯）。隨著類似的經驗越來越多，我逐漸意識到「自己」原來終究跟大家不同，而這樣的落差也讓我感到沮喪和內疚，不知道該如何看待自身的優勢，深怕一個不小心就剝奪了他人的機會，但同時也不想因此就放棄去實現自我，追逐自身的興趣，這種身份的矛盾始終糾纏著我，卻遲遲未能獲得完整的解答。

重新檢視我過去的求學經歷，我彷彿從來就是格格不入的：我先是因為不好的成績，在主流中產階級標準化的菁英教育體系中被判定為失敗者，然後又因家境的差異，在工人階級佔多數的後段私校被看做是陌生的局外人。場域的變化迫使我在不同的身份之間進行轉換，也讓我看見階級和教育之間複雜的交織。我對自己一直以來的矛盾狀態感到疑惑，為何我在國高中的時期會常常覺得憂鬱、自我咎責與羞恥，但進到後段私立大學後，又經常夾雜著自尊自信、格格不入，甚至擔心與愧疚的情感？這樣的轉折和變化，究竟與我所身處的社會位置有何關

聯？它難道只是單純升學教育的問題嗎？還是其實體現了某種階級價值的不公與情感政治的邏輯（陳旺德、陳伯偉、林昱瑄，2020）？這樣的斷裂經驗也使我對階級的再製歷程感到好奇：我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產階級」？為何我明明在中產階級的環境下成長，但卻沒能像「中產階級」一樣，甘願地繼承菁英主義的文化？但倘若我真的那麼不甘願，我又為何在接觸到大學中的階級他者時，依然採取主流社會對「他者」的審視眼光，一心只想擺脫「失敗」的污名？反過來說，如果我擁有工人階級的出身背景，同樣的決定會造就同樣的遭遇嗎？在沒有獲得家庭支持的情況下，我是否還能如此奢侈地「做自己」，將一切「打掉重練」，只為了追逐我想要的興趣和自由？換言之，個體到底在何種程度上會受到階級的結構制約？又在何種程度上不會、甚至能加以超越？在近乎理想的狀況下，階級的故事似乎就像是標準化的電影腳本，總是能藉由給定人物、場景和情節來打造出可預期的結局。但若是從更廣泛的角度來思考「階級作為生涯打造」（doing class as career）的過程，從小（學）到大（學）的求學經歷，以及不同的生命階段，階級的再製也常仰賴主體在階級文化上的繼承，而這個繼承過程往往會因脈絡而異，受到資本的中介和影響，並與重要他人的社會互動息息相關。於此同時，個人的慾望、反思和感受，並非簡化對應其所屬的社會條件和階級位階，其中常常伴隨著衝突、矛盾的階級感知（Reay, 2015）。換言之，透過思考外在客觀階級條件與內在的階級感知，如何在不同人生階段與場域交互作用形塑個人的階級認同，是否能更豐富我們理解階級權力的運作？這也是本研究所好奇的地方。

二、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目前國內涉及階級再製的討論相當多，不論是量化研究或質化研究都累積豐碩的成果——前者主要是聚焦在回答階級**是否**會因為家庭背景而再製（例如探討家庭背景影響學生上國立大學的機率），後者則大多是在前者的基礎上，進一步解答家庭和學校**如何**再製階級不公。具體而言，以量化為主的教育階層化領域，研究者往往是以長期追蹤的統計調查為基礎，針對不同的變項（例如出身和教育

成就)進行縱貫的分析,藉此探討階級再製在教育領域的效果、程度和範圍,並根據特定的理論假設(例如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論、Coleman 的社會資本論等)來測量對再製有利的結構因素,驗證家庭背景對於學習、升學的影響(孫清山、黃毅志,1996;李文益、黃毅志,2004;周新富,2008;林俊瑩、黃毅志,2008;趙佩晴、余民寧和張芳全,2011;張芳華,2015;謝志龍、莊致嘉,2016),抑或是透過教育端的回溯,在制度的層面比較不同背景學生彼此差異的升學路徑和就學分布(林大森,1999;陳怡靖、黃毅志,2011;黃銘福、黃毅志,2014;楊瑩,2014;張宜君、林宗弘,2015;李浩仲、李文傑和連賢明,2016)。相較之下,採取質化取徑的研究則多半更著重於社會互動的細部描寫,嘗試藉由個案的觀察或訪談,分別就家庭教養(翟本瑞,2002;謝孟穎,2003;楊怡蓉,2005;張建成、陳珊華,2006;林郡雯、張建成,2008;朱俐嬛,2013;藍佩嘉,2014)、學校制度(許殷宏,2006;王雅玄、陳靜盈,2012;業書宏,2015)以及學生的就學經歷(蔡雯琪,2015;鄭英傑,2017;呂宗翰,2018;王啟仲,2018;謝宇修,2020)進行深度的考察,以便揭示階級再製背後的實作、文化和心態。上述研究成果,不僅有助於我們跳脫個人歸因的解釋,認識到個人教育成就背後所隱含的制度性成因,也讓我們對國內的不平等現象具備更全面的理解。

現有研究雖然提供我們許多重要的洞見和分析視角,但我認為仍有幾點值得進一步商榷:首先,在分析上,現有研究大多著重於客觀利益的階級分析,將問題聚焦在不同的社會結構條件(例如父母職業、教養方式、文化因素等)如何為個人帶來結構性的優/劣勢,但較少關注個人實際上是如何「成為」(becoming)某種階級的人生歷程。因此,我們不僅難以得知階級不平等究竟是如何被主體所經歷和感受,並且在微觀的層次上,體現於個人的日常實作、反思和情感(例如格格不入、焦慮不安、自信與自卑)(陳旺德、陳伯偉、林昱瑄,2020;Reay, 2005),也無法充分說明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究竟會如何跟自身的「結構條件」(家庭和學校)進行互動,進而忽略個人在不同生命階段的成長和變化。由於沒能從生命史的角度來掌握個人在不同結構位置間轉換的經歷,相關研究傾向將個人的階級出身及其成就視為必然的對應,彷彿階級再製就像是工廠生產線一般的線性過程,忽略了階級作為一種生涯(career)的複雜打造歷程。為了更動態地掌握階級再

製所固有的複雜性，我認為在研究階級時，除了分析客觀的社會結構面，也值得納入個體的主體經驗與社會歷程，進一步思考：在階級繼承的過程中，個人究竟需要付出哪些代價？他／她會如何看待自己與身具來的家庭優／劣勢、協商自我的階級認同？而這樣的協商過程，又會如何影響他們各自的發展和路徑，進而造就出與原有階級不見得一致的再製形式和樣態？

其次，從研究的主題範圍來看，多數研究只聚焦在大學前的階段，少有追蹤比較不同階級學生進入大學之後的發展。為了避免將階級再製簡化為「出身決定論」，我認為追溯個人在末端教育（包括大學和研究所）的經歷有其必要。但現有涉及高等教育階段的研究，除了大多是以量化方法來進行長時段的分析（例如比較不同背景學生進入國立大學的比率），很少從質性的角度探討個人的成長經驗如何影響其大學後的經歷。雖然已有學者研究從生涯的面向探討教育翻身對於工人階級的意義（例如林郡雯、張建成，2008；鄭英傑，2017），但由於他們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解工人階級追求上進的心態，較少說明這些心態和結構位置（上大學）的關聯；而在碩士論文方面，也有研究嘗試探討工人階級上大學的翻身經歷，但這些研究因為大多聚焦於「翻身（為何）成功」的解釋（例如，蔡雯琪，2015；呂宗翰，2018），也沒能對於工人階級進入大學後的認同變化和困境給予同等的關注（少數例外，參見謝宇修，2020，我將在第二章進一步說明）。

為了填補既有研究的缺口，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1. 進入精英大學前，不同階級學生的家庭教養和求學經歷有何差異？
2. 這些差異究竟會如何影響他們進入精英大學後的生活（例如學業與社交）？

我將透過比較不同階級學生進入同一所精英大學的經驗，探討階級、家庭教養與求學經歷之間複雜且動態的關聯，並且試圖從中辨識階級得以存續的可能機制和條件。

貳、文獻回顧

為了深化對「階級再製」的理解，本章節將透過既有研究說明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各自殊異的人生經驗如何影響他們的學習表現。結構安排上，首先，我將先回顧國外相關文獻，說明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教養與求學經驗如何再製階級不平等及其不預期效應。其次，我將回顧本土相關研究，說明「升學教育」與「精英教育」在台灣脈絡下的特殊性與階級意涵；最後再以這些討論為基礎，提出本研究分析概念和面向。

一、工人階級的教養和求學經驗

(一)、家庭與學校作為階級再製的場域

現有研究大多將家庭被視為是階級再製的關鍵場域，特別聚焦工人階級家庭的教養方式和成長環境如何形塑孩童有限的自我期望，並侷限其未來的發展和潛力。舉例來說，Lareau (2002) 透過比較美國不同階級家庭的生活作息和教養方式，發現不同階級的父母往往因為生存條件的不同，在教養上持有不同的態度和策略。根據她的觀察，中產階級家長為了激發孩子的潛能，經常透過「精心擘劃」(concerted cultivation) 的栽培(例如，學習才藝、強調親子間的溝通和協調等)來教育下一代。中產階級的孩子因為從小就備受關注，因此較容易在成長過程中養成獨特的權利感；相較之下，弱勢階級(工人階級及出身貧窮)的家長則更重視基本需求(例如，讓孩子吃飽、穿暖)的滿足，大多採取「自然放養」(natural growth) 的方式養育下一代，很少介入孩子的學習和成長。然而，由於弱勢階級的家長欠缺社會肯認的文化資本，因此在生活中經常遭到制度(如社工、學校或政府機關等)的排除和汙名(同樣見 Lareau, 1987; Reay, 2004a)，這也間接地使得弱勢階級的孩童較容易習得內在的侷限感。

Rachel Thomson (2003) 也提到擁有「錯誤」的社會資本，可能會對工人階級的成長軌跡產生不利的影響。他發現有機會翻身的工人階級，大多是出身自「受

人尊敬」的工人家庭（其父母受過較好的教育且經濟上較為無慮），因此往往能在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如求學、謀職找工作）扮演維繫個人及其階級出身的重要紐帶。但這樣的支持力量卻也可能為了保護孩子免於挫折，反而在個人遭遇挑戰（例如，無法適應高度競爭的學校生活）時，成為拖累個人「幸福的負擔」（認為念書太辛苦，凡事快樂安份就好），對工人階級的學習、成長乃至於可能的社會流動構成隱形的阻礙。換言之，即使工人階級能從家庭獲得穩定的支持，也往往必須面對自身文化作為「資本」的極限，被迫在個人成就和平凡快樂間做艱難的取捨。

Connolly & Healy (2004) 則是進一步從地域性 (locality) 的視角出發，解釋中產階級跟工人階級學生不同的成長途徑和自我期待。他們的研究發現，工人階級因為欠缺資源和機會移動，導致其經驗和視野往往容易受到在地階級社群的牽制和影響（就讀同一間學校、做類似的工作），對地方展現強烈的忠誠和地域感；相較之下，中產階級的世界觀則自由和寬廣得多，很少受到在地的約束，不僅擁有許多自身的規劃和想法，而且經常為了各式活動往返於不同城市。這說明不同資本條件所構成的成長經歷，如何導致不同階級的學生習得不同的慣習，進而對未來產生不同的期望和認知。因此，階級的文化再製不僅關係到家庭內部的文化傳承和資源傳遞，同時也牽涉到更廣泛的社群經驗和世代關係，與個人所熟悉的階級生命地景習習相關。

除了探討工人階級不平等的童年經驗，教育方面的學者也嘗試脈絡化工人階級孩童「教育失敗」的就學經驗，關注不平等的社會條件如何加劇工人階級在教育上的困境，使其難以逃脫階級再製的結構命運。例如，Reay (2003) 提到工人階級學生在選擇學校時，往往容易受到結構位置（主要是成績和居住條件的限制）和階級經驗（擔心遭受霸凌或種族歧視）的影響，限縮自身在教育上的期待和選擇。Archer & Yamashita (2010) 針對工人階級教育期望的研究也發現，許多工人階級學生容易因為結構條件的限制（例如，就讀名聲不好的學校、背負受汙名的階級及種族身份、強調男子氣概的街頭認同等）而限縮自身的教育期望，因此大多在脫離義務教育之後便不再繼續升學，很少將中產階級主流的教育途徑（例如，成為一名大學生）視為理所當然的人生選擇。Ingram (2009) 的研究則顯示，由

於學校教育和工人階級之間在文化上的隔閡，工人階級學生難以在追求「教育成功」的同時也保有自身完整的認同和文化；相反的，為了成為一名合格的「學生」，他們不僅必須面臨許多困難的掙扎和協商（例如，擔心穿制服會被同儕看扁或嘲笑），甚至需要與自身的文化保持距離，才有辦法建立學習的自我，晉升「中產階級」的行列。

Gast (2018) 的研究則是進一步以校園內的師生互動為例，探討刻板印象的運作如何可能強化工人階級在教育上的弱勢處境。她發現，許多老師經常會挪用種族或階級的刻板印象（例如，文化的缺陷和不足）來解讀工人階級學生不良的課堂及成績表現，但在教學上卻又極為強調「機會公平」的意識形態，忽略不同階級學生的背景差異，合理化對工人階級的不支持。儘管工人階級學生經常控訴老師愛找麻煩，並且強調自己遭受差別待遇的經驗，但因為其發言位置欠缺論述的正當性，就算這些現象確實存在，也往往容易被老師和其他學生（中產階級以及少數成績好的工人階級學生）看做是在「找藉口」而予以否定，因而反過來坐實並強化了他們身處邊緣的結構位置。

此外，透過研究工人階級學生在校園中的品味認同和風格實踐，Archer, Hollingworth & Halsall (2007) 也提醒我們：即使某些工人階級學生可能會採取反叛的態度來回應主流教育的階級凝視（例如，透過打扮來維繫自身的文化認同），但這樣爭取認同的表現，也可能因為抵制了制度的規範期待（違反學校的服儀規定），反過來強化社會對工人階級的污名和偏見，從而導致非意圖的自我排除 (Willis, 1977)。換言之，除了階級本身在結構上的種種限制，社會對工人階級的污名和制度性排除，也對工人階級的教育參與造成極大的侷限，儘管這些不利的階級障礙並非工人階級注定失敗的保證，但這些限制的存在，也意味著工人階級學生很難單憑爭取好成績就能夠擺脫制度性的污名，並輕易贏得受人尊敬的好名聲。

(二)、大學教育作為階級翻身的場域

相較於傳統的觀點往往將重心聚焦於工人階級在文化上的再製和延續，使得

過去針對工人階級教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大學前的階段，近年來隨著大學擴大參與（widening participation）的議題在英美日漸受到重視，學者也開始將研究焦點轉向順利進入到大學就讀的工人階級，試圖透過挖掘這些少數「倖存者」的翻身經驗，增進我們對於階級再製的理解和想像。

舉例來說，Reay, Crozier & Clayton（2009）以 9 名工人階級學生進入頂尖大學的經驗為例，說明上進的工人階級學生在成長經歷上的特殊性。她發現，這些成績優異的工人階級學生，多半在早年的就學階段就時常因為難以融入自身的社群（例如，欠缺社群認可的陽剛氣質），歷經許多認同上的衝突和矛盾，但這些水土不服的成長經驗也賦予了他們反思的動力和學習秉性（如，自律、生命的韌性，以及利用最少的資源達到最好的表現），成為他們在學術場域能夠成功的先決條件，使得他們能擺脫自身在階級視野上的侷限，並且最終進入菁英大學就讀。

Lehmann（2009）也進一步提到，這些成功進入大學就讀的工人階級學生，往往具備強烈的自尊及道德榮譽感，而且相當重視刻苦、勤奮以及自律等價值，不僅將這些特質視為奠定自身認同的基礎，也經常藉此來區別自己跟中產階級學生的不同，在「我們」和「他們」之間劃下鮮明的界線；Abrahams（2016）的研究則是發現：工人階級教育翻身的體驗，往往會使他們採取功績主義的理想，深信個人努力的價值。因此，即使面臨不確定的未來（例如，畢業後求職），也經常抱持著「凡事靠自己」的態度，不願意接受任何額外的支援和幫助。

儘管如此，工人階級的翻身過程其實並不輕鬆，特別是他們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劣勢往往使得他們在進入大學後難以適應校園的生活。例如針對工人階級在學校的人際關係，Keane（2011）指出，在中產階級佔主流的大學中，許多成績優異的工人階級學生因為害怕遭受同儕差別對待（例如被同情、看扁或排擠），往往會傾向在社交上採取自我孤立的態度，將上大學的目的侷限於「只為了讀書」，避免與同儕建立過深的關係。Scherer（2020）也發現相較於許多中產階級學生在跟教授交流時總是能表現的泰然自若，工人階級學生因為欠缺必要的文化技巧和知識（例如，不知道怎麼展現自信、創造與教授認識的機會等），往往沒能跟教授建立良好的指導關係，因此容易在無形中錯失許多重要的機會。

此外，Bourdieu 提醒我們，階級慣習（habitus）作為個人的內在過去，不見

得會隨著場域的轉換（進入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大學）而持續演化，相反的，它可能會因為無法適應新場域的規範要求，從過去的資產變成今日的累贅，並對個人形成難以言喻的障礙。舉例來說，透過訪談 17 名中國工人階級資優生的升學經驗，Jin & Ball（2019）發現，許多工人階級學生為了爭取翻身的機會，往往必須高度仰賴制度的期待和標準（例如，考試分數），並且為了培養制度要求的慣習（例如，努力勤奮的讀書習慣）而疏離原有的家庭和人際（例如，為了升學而住校）。但這樣過度投入的結果，往往會使得學生進入心目中的理想大學之後，因為外在場域標準的變化（讀書不再是唯一的標準）經常感到無所適從、不知所措。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得知，工人階級在家庭和生存環境上的劣勢，往往使得工人階級很難跟主流教育建立有意義的關聯，導致教育制度強化了階級不平等。儘管在大學擴大參與的脈絡下，工人階級也可能突破階級不公的桎梏，進入大學就讀，但這樣的突破往往也帶來了水土不服的適應問題。然而，上述研究也提醒我們，在分析上需思考工人階級學生如何協調主流教育與自身階級劣勢所帶來的內在衝突，並思考工人階級的成長經驗如何既是困境也是滋養。

二、中產階級的家庭教養和學校經驗

（一）、家庭與學校作為優勢傳承的場域

針對中產階級究竟是如何維繫自身的社會優勢的，現有研究大多相當強調父母（特別是母親，見 Reay, 2005）在優勢繼承和資源傳遞上的角色，除了承襲 Lareau 對於「家庭優勢」的分析，致力於比較和驗證中產階級家庭在教養文化上的差異，也相當關注家庭教養對孩子學習秉性的影響，探討中產階級的父母是如何藉由教養形塑的內化，賦予其下一代特定的文化優勢。

舉例來說，Archer, DeWitt, Osborne, Dillon, Willis & Wong（2012）藉由一項長期追蹤的研究，發現家庭的文化支持對於孩童的科學態度和教育期望具有重要的影響。他們指出，比起單純的經濟條件，家長的價值、期望和教養方式，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會形塑孩童對於未來的認知，限定他們對自我的期望和途徑。而相

較於工人階級的父母往往無法提供下一代必要的協助，中產階級父母因為擁有較為豐富的文化資源（例如，從事科學相關的專業工作），往往能提供孩子清楚的教育期望和路徑（例如，立志成為一名科學家）。Chin Ee Loh & Baoqi Sun (2019) 指出，中產階級孩子從小就有許多接觸書本的機會，而且因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例如，仿效父母閱讀報章雜誌、跟其討論和交流）的影響，更容易將閱讀當作自身的習慣或興趣，因此在銜接正規教育時，往往能比工人階級的孩子更快融入學校的文化。這再次說明了中產階級家庭在文化傳遞上的先天優勢。Calarco (2014) 則透過訪談和觀察不同階級學生在教室的表現，進一步發現中產階級家長的教養方式對於孩童的學習態度具有正面的作用：工人階級的家長在教育孩子時，往往習慣採取較為被動的態度，告誡孩子不要找藉口（no excuse）、凡事靠自己就好；中產階級的家長則往往像是孩子的私人教練，經常鼓勵孩子要懂得善用各種手段（by-any-means），主動尋求大人的幫助。也是因為如此，中產階級家長不僅在無形中賦予孩子更強的權利感，也使得他們在遭遇困難時，更願意主動尋求幫助，從而獲得老師的關注。

學者也提醒我們，中產階級的父母為了讓孩子贏在起跑點，經常會透過自身的層層把關和超前部署，主動介入下一代的教育過程，以此確保孩子保有順遂的未來。例如，Reay (2004b) 的研究發現，在實施學區制的公立體制下，多數中產階級家長為了「捍衛」孩子的教育，往往會不擇手段，運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例如搬家、置產或謊報居住地址等）來逃離制度的管制，避免讓孩子就讀名聲不好的學校。Lois Weis & Kristin Cipollone (2013) 也提到，對於中產階級家長來說，能否替下一代在教育上做出「正確」的決定其實是至關重要的。根據他們的研究，選擇公立學校的家長們，往往會採取「先介入、後放手」（laid back）的策略，從小便透過精心擘劃的安排（預先置產取得公立名校的入場卷、讓孩子上先修課程、取得資優鑑定的資格等）來培養孩子渾然天成的優勢。相較之下，選擇私校的父母雖然相對開放，傾向將大部份的責任都交由學校負責，但是到了真正申請大學的重要時刻，也大多會極力投入申請過程（例如幫忙擬定選校策略、寫畢業論文和推薦信等），很少放任孩子獨立做主。Hamilton, Roksa, & Nielsen (2018) 針對大學階段的研究也呼應上述的看法，他們發現：即便是進到了大學，這些家長也

從來不曾缺席，他們反而就像是孩子的「貼身守門人」(concierge)，不僅在經濟上給予全面的支持，也時常透過實際的關懷和建議（例如鼓勵孩子參加聯誼來拓展人脈、透過加入兄弟會、姐妹會打入菁英的社群）來幫助孩子，以確保他們不會犯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些主動的介入，對於原本即出身富裕的學生來說，無疑像是如虎添翼，更加強化了階級的不平等差距。

除了從家長的實踐來看待階級，也有少部份的研究嘗試從學生的經驗出發，進一步說明中產階級的優勢認同和菁英文化。透過研究英國中產階級學生在國小階段的次文化實作，Kehily & Pattman (2006) 發現中產階級學生大多會在「專心唸書」的自己和「不愛唸書」的他者（多半是工人階級學生）之間做嚴格的區分，並且極度鄙視後者的不成熟，認為這些學生只會靠喝酒和抽菸來強化自身在同儕間的地位，但卻無法學會為自己的人生負責。相較之下，他們雖然在早年的就學階段，因為投入唸書而時常被同儕貼上「不酷」和「無聊」的標籤，但畢業之後，他們反而能換得更多的自由（能上大學追求想要的人生，而不需要到街上打工）。有趣的是，Kehily & Pattman 也發現這種升學成就的差異，也讓中產階級學生在日後接觸到類似的「反文化」（例如，抽大麻）時，更有條件將自己越矩行為正當化為成熟個體的作為（因為了解自己要什麼，而非受到同儕的壓力），以自身的與眾不同和優越來對比工人階級的狹隘和侷限。此外，Jarness (2019) 的研究則是以挪威菁英高中的服裝儀容為例，說明菁英學生內部的象徵劃界和分類排除。他指出，儘管挪威不存在服儀的規定，但學生對於何謂「好」的裝扮往往享有強烈的規範標準，而且相當強調「自然不做作」和「過於投入」(trying too hard) 在身份品味上的差距：學生們通常將「表現自然」視為優勢的象徵，認為這反映了一個人應變不同場合和需求的能力；相反的，過於顯眼或刻意的外觀（即使這樣的裝扮能反映其經濟實力）則往往是「過度在意」的象徵，因而容易遭到鄙視和嘲笑。這說明了中產階級的文化不只是在家庭的層次進行再製，也在認同的層次成為個體劃界的一部分。

(二)、階級傳承的代價與不預期效果

然而，中產階級的「再製」並非總是那麼一帆風順，它同時也潛藏著各種代價和不確定性。例如，Lucy & Reay (2002) 提到，許多中產階級家長為了確保下一代的優勢，不惜在初中的階段就把孩子送往學習表現高成效的學校 (high performing school)，藉此培育孩子在未來階段的競爭力。然而，這樣的再製策略很可能會導致預期外的效果，讓中產階級的孩子深陷於高壓的學習環境中，為了追求分數而付出極大的心理代價 (例如，因為擔心自己不夠好而自責和焦慮)；Galloway & Conner (2015) 也發現在這種競爭至上的菁英文化下，中產階級學生經常容易感到侷限和無力：因為他們一方面必須迎合家長和老師的期待，被要求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發現自己就算再怎麼努力，也總是會有人比他們優秀，這往往使他們在求學的過程中備受挫折，甚至容易感到自卑、懷疑。對於中產階級學生而言，學業成功其實就像是一把雙面刃，不僅象徵著家庭賦予的優勢，同時也附帶許多沉重的義務和代價。

Lareau (2016) 則是以中產階級家長申請幼稚園的經驗為例，進一步指出資本在特定脈絡下可能遭遇的侷限和困境。根據她的觀察，雖然中產階級的家長在申請學校時往往擁有極大的優勢，但制度本身所包含的不確定性，像是學區置產規定的改變、截止日期及註冊資訊的不透明或是學校間不一致的入學標準，也可能導致家長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使其無法單憑手中的資訊、人脈和資源獲取可欲的結果，而必須承擔許多額外的心理負擔和焦慮。這意味著光是擁有資本也無法保證這些資本總是能夠被順利地「兌現」；相反的，資本是否能夠產生優勢，往往還必須考量其在具體制度脈絡下的作用 (Lareau & Weininger, 2003)。

此外，Lareau (2000) 也提醒我們，階級再製從來都不是一個「自動實現」的過程，中產階級的優勢是否能夠被成功的動員和運用，除了必須考量到資本運作的制度條件，也高度仰賴主體本身有意義的投入和參與 (Willis, 1977; Lareau, 2000)，特別是中產階級在認同層次的建構和協商。例如，Kaufman (2005) 指出，中產階級學生不見得會遵循父母一切的想法和安排，相反的，家庭資源是否能夠發揮優勢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學生自覺的投入和參與，像是界定自我期望的「成功」路徑 (探索自己擅長又有興趣的學科)、體驗打工和職涯規劃的差異、篩選志趣相投的交往對象等。中產階級學生因為佔據著相對有利的資源和位置，

使其較有能力針對自身的處境進行反思和選擇，不過這也使得優勢的建立往往高度仰賴學生在認同上的探索和詮釋；Sherman（2017）的研究則是從階級的道德面向（Sayer, 2008）切入，細緻地說明了中產階級母親在「優勢繼承」上的認同困境。藉由訪談五十名紐約中產階級家庭的育兒策略和教養論述，她發現多數中產階級的家長雖然希望讓孩子過上好的生活，但也擔心過度優渥的成長環境會影響孩子在道德上的人格和發展。為了將孩子撫養成一名的「好人」(good people)，許多家長一方面採取約束的策略來避免孩子理所當然的鋪張浪費，另一方面也嘗試增加孩子對外界的接觸（例如，參加夏令營、上公立學校），讓孩子有機會跟不同階級的同齡進行交流。儘管如此，家長們也害怕過度的約束和接觸，可能會對孩子的未來產生不利的影響（擔心孩子在公立學校會學壞），因此對於採取刻意「窮養」的教養策略，經常抱持著猶疑和矛盾的心理。上述的研究告訴我們主體投入的重要性。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得知，中產階級無論是在教育期望、學習秉性或生涯規劃方面常具備「先天」優勢，這往往有利於他們契合主流教育的文化。但儘管如此，我們也知道，這個再製過程並沒有那麼容易，它同時也牽涉到許多不確定性和代價。這說明了教育作為中產階級優勢再製的雙面刃，雖讓小孩容易贏在起跑點，但另一方面卻也容易背負著家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沈重期待。因此，本研究在分析上，也將同時思考階級優勢的承襲與不預期的效應。

三、回到台灣的脈絡：階級、升學與菁英教育

國內相關研究大多呼應國外學者的觀察，指出階級不平等在教育領域的再製趨勢，但也試圖點出升學教育與標準化考試在台灣的特殊性。由於台灣實施標準化的考試制度，升學早已是台灣學生的普遍經驗，常被視為是教育公平的象徵。國家為了促進教育現代化的目標，大力推動高等教育的擴張，也使得大學不再是少數階級的專屬特權。但儘管如此，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顯示，即使是在台灣相對「公平」的體制下，家境好的學生依然擁有較高的機率進入菁英大學就讀（駱明慶，2002），而且公私立大學的教育分布也存在著嚴重的階級分化和

逆向重分配的現象（駱明慶，2004；楊澄，2014；張宜君、林宗弘，2015）。為了掌握台灣的特殊性，學者也開始關注階級不平等在台灣的演變形式，嘗試從制度和文化的角度來提出可能的解釋和回應。

例如，在工人階級方面，林郡雯與張建成（2008）比較不同階級國中生對於文憑的態度，他們發現即使是出身弱勢的工人階級學生，也大多對學歷抱持著正向且肯定的態度。儘管比起中產階級學生往往將獲取文憑視為理所當然，工人階級則是傾向將念書視為一種自我警惕的象徵，擔心「萬一我沒有的話，可能會像爸媽一樣」，以匱乏和羞恥來界定他們與教育的關係。鄭英傑（2017）也提到在台灣重視讀書的文化脈絡下，工人階級學生和家長可能會為了「脫貧」或「爭面子」而特別看重唸書的價值，而且這些態度往往會落實在這些工人階級的求學歷程中（例如，運用「免費」資源、有效運用時間），成為他們爭取向上流動的助力。謝宇修（2020）的研究則是嘗試指出教育翻身背後的「陰暗面」。他發現，對於第一代大學生來說，擁有高學歷其實是一種充滿矛盾的經歷：因為學生和家長在教育背景上的落差，往往使得他們對於教育有不同的期待和想像，因此即便取得高學歷，也容易在親子關係上形成世代的隔閡和矛盾。同時，他也提到，這樣的翻身其實像是賭注，因為這些子女不見得都能夠從大學教育獲得自身的認同，而且即便進入到職場中，先天經濟條件的不足，也不見得能讓學歷發揮翻身的的作用，反而讓他們有受騙的感覺。換言之，工人階級雖然在一方面將升學看作向上流動的手段，受惠於主流的教育體制；但另一方面，卻又必須承擔流動的代價。這說明了工人階級與主流教育之間既曖昧又矛盾的關係。

針對中產階級，相關研究也指出升學教育可能具備的不平等效應。像是業書宏（2015）指出，比起國外在談及「文化資本」時往往更重視學生的品味和教養，但在台灣標準化測驗的升學制度下，能否建立良好的讀書慣習才是關鍵，中產階級也能透過公平的制度效應，強化階級的刻板印象。王啟仲（2018）的研究則是以菁英高中生的次文化活動為例，進一步說明菁英學生是如何透過展現能 k 又能玩的叛逆氣息，將學業競爭的慣習再製於音樂表現的場域，進而劃分並維持自身在教育體系內的優勢位階。藍佩嘉（2014）透過分析不同階級父母的親職腳本和實作時發現：雖然在全球競爭的脈絡下，父母往往為了孩子的未來，必須在「競

爭力」和「自然長大」兩種價值之間糾結。但是，相較於工人階級家長不是必須高度依賴學校體制便是無力介入孩子的教育，中產階級因為享有較多的資源和文化優勢，往往能藉由多元的教養來區辨秀異，打造子女的國際流動力。即便家長不願意遵循傳統教育的價值，也能透過援引國外的教養論述，來打造讓子女「自然成長」的環境。換言之，中產階級父母不僅在文化上更加親近成功教養的期待，比工人階級存在更多的選擇，即便自己所欲的教養方式遭受挑戰，但自身階級的屬性並不會因此而遭受質疑。

上述研究提醒了我們台灣教育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即便升學考試是多數學生人生必經的階段，但並非所有人都會均等地受制於升學主義的邏輯。儘管台灣的教育並不像西方社會，往往較為重視學生個人的素質和文化資本（而非標準化的考試成績），導致階級之間經常存在嚴重的分歧。然而，升學教育也沒能弭平階級之間的不平等，依舊與家庭教養以及學校教育息息相關。因此，透過比較不同階級的家庭教養文化和求學經歷，本研究將試圖勾勒階級在台灣社會的樣貌與運作邏輯。

四、小節

在本章中我說明了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各自殊異的成長學習經驗，以及階級在本土脈絡下的特性。透過文獻的爬梳，我們可以看到主流教育對於不同階級背景的學生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對工人階級來說，受教育就像是經營一場高風險事業，不僅失敗率極高，其成功本身也充斥著各種不確定性；相較之下，中產階級的教育歷程就像是進行一場神聖的階級保衛戰，它雖然為中產階級帶來了權利，但同時也附帶許多沉重的義務。另外，台灣研究也提醒我們不能忽略升學教育在台灣的重要性，它可能會使階級不平等以不同的形式和文化地景呈現。

另一方面，藉由上述的文獻回顧，我們也可以發現，Bourdieu 對階級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代學者的研究（例如 Lareau , 2002; Reay, Crozier & Clayton , 2009; Jin & Ball , 2019），也為我們帶來許多獨特且豐富的洞見。尤其，相較於傳統的階級理論（例如馬克思主義，社會階層論等）往往將「階級分析」

侷限在純粹經濟的層面，Bourdieu 提出的資本（capital）概念（包含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掌握和評估個體在基礎生存條件上的處境（Savage, Warde & Devine, 2005）。另一方面，慣習（habitus）和場域（field）的概念也讓我們能夠對個人在不同階段的成長歷程和文化經驗更為敏感，而不至於將階級簡化為靜態的結構位置。由於 Bourdieu 並不將「階級」視為一個預先給定的位置，而是持續演進（因而有待分析）的社會過程，因此特別適合用來理解不同背景學生在不同場域（從家庭到國高中階段再到大學）穿梭的經歷。

然而，誠如許多學者的批評，Bourdieu 在運用慣習時，往往太過強調慣習自我再製和延續的能力，因而忽略了其中可能的偏離、演化和斷裂（Jenkins, 1992; Sayer, 2008）。雖然在談到過往的翻身經歷時，他曾以慣習來說明自己作為農民後代在精英場域流動的矛盾心境（Bourdieu, 2008），但儘管如此，他也從未嘗試進一步在概念上理論化這些看似主觀的「私人情緒」。尤其，Reay（2015）提醒我們階級情感作為慣習的產物，在分析上其實是相當有用的思考工具，它不僅有助於我們辨識階級慣習和個人情感的關聯，也讓我們能夠有效地捕捉慣習在不同場域下的具體反應和變化。換言之，當我們進一步延伸慣習的意涵，分析個體的情感（例如驕傲和自卑、自信與不安等）究竟是如何被慣習所中介的，我們可以將個人的內在世界和外部的社會結構加以連結，更切實地掌握階級運作的邏輯（Reay, 2015）。

為了探討不同階級背景學生在不同場域遷移的經歷，我將以 Bourdieu 提出的概念框架（資本、慣習和場域）作為理論分析的基礎，並且在 Reay 的修正下，進一步引入「階級情感」的面向。實際用法如下：首先，在資本方面，我關注的是哪些客觀的外在條件能為學生帶來結構性的優勢。這並不僅限於家庭提供的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本，也包括學校在制度上所帶來的好處，像是考試成績。其次，慣習作為「資本得以運作」的主體條件，則是本文另一個關注面向。在這個部分，我會將焦點放在（1）家庭教養和學校經驗如何形塑學生的性格，並對其造成長遠的影響，例如講究紀律的考試性格。也關注（2）這些慣習，究竟會在哪種條件下啟動和運用資本？又在哪些條件下失效？最後，我會進一步分析學生在不同場域處境下所產生的階級情感，以便評估慣習和場域的互動（例如，探討個人在

大學前和進入大學後的差別)。透過此分析策略，我將說明學生在升學歷程中的斷裂經驗矛盾情感如何形塑自身的階級感知，同時也繼承自身的階級文化與慣習。最後，我也會探討這些認同對他們結構位置造成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徑

為了充份理解不同階級背景學生進入菁英大學的經歷(包含大學前的成長經驗和大學後的校園經驗)，本研究在方法上採取一對一的深度訪談，期望能借助個案的經驗和敘事來辨識具有理論意涵的趨勢。儘管就方法論的角度而言，聚焦於個體層次的分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對宏觀制度(例如甄選考試制度)的關注，也難以針對特定的場域深化我們對於社會結構的理解(例如探討台大校園內部的菁英文化)。但我認為，這樣的取徑卻有助於研究者辨識結構和個人之間具體聯繫的方式，讓我們能在看見結構力量的同時，也體察被研究者在結構下的猶疑、不確定和矛盾。也是因為如此，透過本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看似例外但卻解釋規則的案例，像是中產階級學生明明享有成功順利的前途卻欠缺成就和快樂，而工人階級學生也不見得總是嚮往繼承父職，對底層的出身感到驕傲和榮譽。儘管這些「個案」在重視結構分析的理論傳統面前，往往容易被視為無關緊要的「例外」或「雜音」，但透過這些活生生的個人經歷和敘事，我希冀更細緻地掌握階級流動在台灣教育脈絡下的樣貌與演變。

二、參與對象

針對參與對象的篩選，本研究主要是根據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的原則，採取三個考量的要點：首先，針對菁英大學的認定和選擇，本文鎖定畢業於台大畢業生作為研究訪談的主角，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台大作為歷史名校，其學術聲望與社會聲望皆受到大眾肯定，符合社會對於精英大學的想像，因此探討其學生的經驗，有助於我們理解不同階級的教育流動狀況及其實際處境。其次，為了避免不同世代在制度經驗(例如課綱、入學管道和標準乃至於就學經歷等)上可能存在的斷裂和分歧，我也將受訪者的年齡限定在 25—30 的區間。下限設定 25，是為了將限定在九年國教的範圍，避免涉及之後歷經教育改革的世代，上

限 30，則是為了避免距離畢業過度久遠，導致其敘事容易受到出社會後的經歷的影響。另外，對「階級」的操作定義，本研究則是依循過往研究的做法，以學生家長的職業和教育程度作為階級分類的依據，並且在此基礎上，將學生初步劃分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兩種身份。

本文訪談主要是於 2019 年五月到九月期間完成，總共為期五個月，並透過我的人際網路尋找有意願的受訪者。但儘管如此，在尋找受訪對象的過程中，我發現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能向外拓展的人際網絡似乎是存在落差的。中產階級的學生雖然大多能夠介紹受訪者，但他們往往同樣是來自中產階級，很少有跨階級的友誼。相較之下，工人階級學生則很少有向外拓展的人脈，並且在大學中傾向擁有孤立的人際，很難經由他們來滾雪球，獲得額外的受訪機會。因此，為了補足這項落差，我也透過網路來徵求可能的參與對象。

本研究最終正式訪談了 7 名台大的畢業生（中產階級 4 名、工人階級 3 名），有六名是台大學士，一名台大碩士。他們在學業上的表現都相當優異，但是出身背景卻極為不同（參見表一）。就家長的社經背景來看，中產階級的家長大多擁有大學（包含大學以上）學歷，並且擔任像是教師、公務員或主管等白領專業的職務，具備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收入；工人階級的家長則因為學歷不高（僅有一位的雙親擁有五專學歷），多半是從事像約聘人員、保全或攤販等不穩定且低薪的工作，有些甚至面臨長期失業的困境（三位當中有兩位的父親長期無業）。

表 i、參與對象簡歷

階級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最高學歷	原生家庭的階級位階			畢業後現況
					職業	教育程度		
						母	父	
工人階級	小業	男	25	台大碩士	母親擔任公部門約聘人員，父親從事保全業	五專	五專	在美國攻讀資工碩士
	阿成	男	29	政大碩士	母親在市場擺攤，父親無業	國小	高中	在金融業擔任 PM

	小傑	男	25	台大 碩士	母親在私人診所擔任牙醫助理，父親無業	國中	高中	待業
中產階級	阿俊	男	26	台大 碩士	父親為國立大學教授，母親為公立高職教師	碩士	博士	申請就讀美國 電機博士
	泡泡	女	29	台大 學士	父親在貿易公司擔任主管，母親為法務部職員	大學	大學	在科技業擔任 PM
	阿容	女	29	台大 碩士	父親擔任工廠廠長，母親為國小校長	大學	五專	在新創公司擔任 PM
	阿尼	女	29	外國 碩士	父親為科技公司老闆，母親為家庭主婦	大學	大學	在外商公司擔任 部門主管

而在學習路徑方面，他們也呈現出不同的傾向：中產階級學生多半都是明星高中出身（四位中有三位），其大學後的發展也大多集中於熱門的專業領域（男電機、女企管），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和延續性；相較之下，工人階級學生僅有一名具有明星學校的背景，而且學習路徑多半相當斷裂，有許多轉折和跨領域（不論是轉系或是在畢業之後報考其他領域的碩士）的經歷。

三、訪談的進行方式

由於訪談關係的建立，首重信任和透明性的原則，如何顧及研究者和受訪者之間的平等至關重要。因此，除了接受主動來信，每次徵詢潛在的受訪對象時，我都會向對方表明自己從事研究的身份和目的，並提供訪綱給對方參考。如果對方有意願受訪，我也會告知他們訪談實際進行的方式，以及他們作為參與者的基本權利（例如，可以隨時中斷和提問、或是基於個人隱私拒絕錄音、保留或刪除錄音檔的備份等）。訪談進行的地點包括在他們的家中、公司辦公室、員工宿舍，

盡量是選擇能夠不受外界干擾且能讓他們暢所欲言的場所為主。每次訪談原則上控制在兩個小時內，前一個小時通常會著重在基本背景的理解，引導對方講述自己是如何一路念到菁英大學，接著再依照個人故事主軸的不同，針對不同的環節進行細部的追問。訪談的面向，主要是以受訪者的「升學史」作為敘事的主軸，特別聚焦受訪者在不同求學階段（主要包括大學前、大學後）所遭遇的經歷、抉擇和困境，包括家庭的教育投資、從小的學習方式、大學前後的學業表現、不同階段的學校選擇等；但在實際訪談的過程中，我也會搭配受訪者的生活圈來當作輔助的話題，探討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人際關係變化、家庭親子關係的互動、生活習慣和價值觀的養成，以便理解不同場域（主要是家庭和教育）在各個階段所扮演的角色和意義。但為了避免缺漏，如果有必要，我也會邀請受訪者進行第二次的訪談，以確保所有的問題面向都能被涵蓋。每次訪談結束之後，我都會提供對方一定程度的回饋（例如提供訪談費用、請客或協助其私事等），並主動詢求可能的建議，針對訪談本身反省可以改進的環節與問題。

四、資料分析

在分析上，我主要是利用編碼與分類的方式來捕捉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展現的各種感受、想法和實作（Strauss & Corbin, 1998）。誠如 Strauss & Corbin 的建議，質化研究應當要能夠適時地穿梭在經驗與理論之間，並且透過兩者的辯證逐步深化對於既有現象的理解。因此，每當完成一場訪談，我都會盡可能地藉由個案的故事來蒐羅各種可能的面向，並且從中辨識重複浮現的現象和範疇（例如，榮譽和羞恥、焦慮和自信等），以此為基礎來累積我對主題（亦即學生進入菁英大學的體驗和經歷）的掌握和理解。接著，我會透過比對這些範疇的特殊和共通之處（例如，透過不同個案的比較，探討羞恥是否是所有學生共有的經歷，還是專屬特定階級的情緒？），在概念的層次上將其整合，納入不同的主題（像是民主／威權式的家庭教養、階級價值與繼承、大學前後的斷裂和延續等）。最後，再運用這些分類好的主題回頭審視相關的經驗資料，與既有的文獻進行對話，一步步地建立分析的主軸。但必須強調的是，上述的過程並非是一系列線性的程序，

而是一段必須不斷反芻、思辨並來回往返的正向反饋過程。此外，就解釋的目標而言，由於本研究的目的並不於對個案本身進行一般性的推論，而是期望能夠借助探討這些個案的性質來深化我們對於再製機制的理解。



肆、成為「菁英」：工人階級的進擊與反噬

本研究欲藉由探討不同階級背景學生的家庭背景和求學歷程，理解他們究竟是如何繼承自身的位階的。在本章中，我將先介紹工人階級歷經翻身的兩種不同的教育軌跡類型，我依照他們成長經驗的特性，分別將其命名為「**倖存者**」和「**屈從者**」。我會從他們的家庭教養開始說起，描述他們的成長經驗如何影響他們跟教育的關聯，以及他們進入菁英大學之後的發展。他們的經驗一方面突顯了他們作為工人階級的共同問題，但同時也顯現出他們各自在成長經驗上的差異。理解他們的經驗，有助於我們更了解他們升學路上的阻力，以及這個阻力所反映的制度問題。

一、順制度而生的倖存者

(一)、順其自然長大

誠如 Lareau (2002) 所指出的，工人階級的父母往往為了維持家計，難以顧及下一代的成長和學習，放任孩子「自然成長」是他們常見的養育方式 (Lareau, 2002)。倖存者的父母也不例外，他們大多是從事低技術、社會聲望低的工作 (市場攤販、約聘人員、保全等)，不僅收入相當不穩定，作息時間也非常破碎。於是，每當談到他們的童年經歷，父母不是經常「缺席」，便是很少被提及。例如，阿成提到自己從小到大「一直都是自己上下學，就連畢業典禮我爸媽都沒來過」，由於父親長期失業，母親為了撫養他跟姐姐必須天天上市場擺攤，從小就沒什麼時間能夠陪他：「我小時候都是一個人在家讀書然後看電視，就是完全是自主學習的」。他們的父母為了節省精力和時間，往往傾向在教養上採取弱勢的介入，很少約束孩子的生活。

對於這些工人階級來說，他們的父母沒有太多時間能陪伴孩子，物質的付出經常是他們展現關懷的方式，而相對的，這些工人階級學生也大多很早便養成早熟和獨立的性格，不僅經常協助分擔家務，甚至懂得在金錢上自我節制、體諒父

母的辛苦付出。例如，小業跟我提到，父母對他其實很大方，很少拒絕他的要求：

「我要東西，他們就是盡量滿足你，他們會盡量滿足我，但他如果不能滿足我，我就知道我們家大概不行，他們都會覺得可以可以，還撐得下去，很好，你怎麼會覺得不行呢～可是我覺得他們沒有辦法給我，就是不行啦」

不過，雖然父母總是很願意付出，他始終「很少講我要買什麼」，即便小業從小經常羨慕同學有各式新穎的玩具可玩，他也從來不曾跟父母開口，一直到碩士畢業才買下人生第一台掌上遊戲機。由此可見，他們跟父母的關係，既不存在傳統勞工階級家庭常見的威權，也不像中產家庭那樣擁有親子之間的親密依賴和互動；相互扶持和體諒反倒是他們維繫彼此的方式。由於父母一直以來都給予他們極大的空間和自由，所以，即便他們從小的生活相對困難，也很少感到剝奪和挫折。

儘管如此，雖然他們大多跟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也不認為經濟上的匱乏曾對他們造成影響，可是一旦談到父母在教育上的角色，卻又顯得相當無力和失落。像是阿成，儘管他從小在學校「每次都考第一名」，但「我們家人其實都不管我在讀什麼，也不會管我成績好不好」，由於他父母最高的教育程度「只到高中」，所以「他們好像對於教育這件事情沒有什麼想法」。相較之下，小業的爸媽雖然相對理解受教育的價值，也經常跟他告誡「會讀就會好」，但實際上也往往僅止於鼓勵和支持，「很少跟我講要怎麼規劃，後面怎麼做」。相較於主流教育成就，倖存者的父母更在乎孩子是否能平安長大，所以從小到大，只要孩子沒有遭遇危險或在外面學壞，父母很少干涉孩子的成長：

「像我二姊就很不會讀書，他就是成績很差那種，可是我爸媽也不會覺得你一定要去補習或幹嘛，就是，你不要做壞事，他覺得就 ok 了，然後像我很會讀書，我爸媽也沒有覺得說特別多給你什麼幫助，就是我自己想補習就跟他們說，他們就會想辦法讓我去補習，可是我如果沒講，他們就不會主動去做那些事情」

Reay (2004a) 指出，工人階級的父母因為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以至於他們往往較不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即便有意願也可能礙於文化資本的不足，無法提供子女必要的協助 (Reay, 2004a)。也是因為如此，相較於學業成就往往需要大量文化資本的支持，工人階級的父母更常要求子女擁有良好品格表現。

(二)、制度化的天賦和自信

幸運的是，在台灣標榜「公平」的考試篩選制度下，家庭在教育上的不足不僅沒有侷限倖存者的教育，反而還賦予了他們一定程度的相對自主性，能順利地接受主流教育的洗禮。特別是他們大多在早年的就學階段就發覺自己更擅長唸書，使他們很快便融入主流的教育文化。例如小業說道，天生敏捷的記憶力和反應力，讓他從小就在同學當中顯得出眾：

「上課的時候我就覺得其他同學反應很慢，我就會先講答案，然後老師就會生氣說不是每個人都跟你一樣那麼聰明，這樣（笑）」

由於他在學校的成績表現向來優異，所以在班上常常有機會「教人」，也「一直能獲得肯定」。阿成則是跟我談到讀書帶來的好處：「因為我的成績很好，老師都會幫我申請獎學金」。學校老師為了讓他能夠專心發揮所長，總是會特別關注他的需求，並且在實質的層面提供他各種資源和協助。換言之，「會讀書」的身份不但讓他們在同儕之間佔有一定的地位，同時也在制度上構成某種保護的作用，帶給他們許多校內的優勢。此外，由於台灣採取標準化的考試制度，成績往往被看作是進行教育篩選和分流的重要判準，這也賦予了條件讓他們能夠憑藉自身的「天賦」來積累自身在教育體制內的籌碼，而不必擔憂任何來自家庭方面的障礙和不利。以小業來說，因為他的分數向來都是「最高」的，「沒什麼好選的」，一路就順利地進了建中。阿成雖然因為家居偏鄉，沒能有機會就讀位處都市的明星學校，但是在國中高中因為受惠於校內的「能力分班」，在求學過程中也不曾受

到「不好環境」的干擾：

「學校有分 AB 班，我記得是國二升國三的時候他們就把兩個班合再一起，這兩個班裡面成績比較好的就是 A 班，比較不好的就是 B 班，所以其實你的環境都是比較會讀書的人」

小業跟阿成就像是 Jin & Ball(2019)筆下所描繪的「制度化兒童」(institutional children)，因為受到制度的支持而取得了向上翻身的機會 (Jin & Ball, 2019)，他們不僅享有相對順遂的教育體驗，而且在反覆的成功經歷下，也厚實了對自己的自信心與自我掌控能力。也是因為如此，從小在家庭方面的弱勢，在這樣的脈絡下不但沒有構成任何阻礙和汙名，反而像是戰士從戰場歸來的傷口，被他們視為自我榮譽的象徵，制度的體驗讓他們極度深信功績主義的價值，塑造了某種「凡事靠自己」的信念，並且對於自己的努力感到自信和榮譽：

「我不會說是教育幫助了我，因為其實從小也是我自己努力讀書讀來的，並不是教育的制度有什麼讓我，你知道，就是比人家還厲害，那是我自己努力，如果今天不努力我就是廢物阿，所以我覺得幫助我最大的應該是我覺得自己蠻幸運跟自己的努力」

(三)、大學作為階級翻身的跳板？

可是，這樣的自尊自信雖然有利於他們在教育體制內晉升，卻不利於他們決定自己的生涯，特別是在沒有家庭協助的情況下，這些工人階級學生往往在高中考大學的時候感到極度的不知所措。例如，小業提到當時的情況，語氣中挾帶著不滿：

「那時候我也從沒想過要走什麼路，所以像我剛剛說的嘛，就是我也沒有在關心那個，我們家裡面反正就是考高分就好，那個時候我考大學就沒考

很好的分數，我就，有點失望，所以我媽就隨便填那個志願，按照那個分數填下來，所以就還是進了台大的 XX 系。

問：是你媽幫你填的？

對阿我媽幫我填的，所以進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系，什麼 XX 系，因為我也不知道，就是其實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念什麼東西，而我爸媽也沒有說我要念什麼東西，有什麼想法，我也沒有什麼想法，所以就按照分數填下來，只要是台大上就好，我們的想法也就是這樣，而且就結果而言，我也覺得這樣也是不錯，就只要是台大上了就好了，什麼都可以。」

這些工人階級學生對未來的規劃，就如同這段引文顯示的，他們既不知道自己該期待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的學業成績有何用途，「沒有想法」壟罩了他們，所以，在選擇學校的最後一刻，也只能依靠「選校不選系」的邏輯，確保「台大上就好」。儘管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再合理不過的決策，因為「我自己家人的成績都是比我差的，沒有人質疑我，我算是最好的那個了」，除了繼續前進，別無選擇。

但小業和阿成沒有預料到的是，純粹學歷地位的轉變，並不保證他們能克服不同結構位置在文化上的落差和不一致，尤其在對大學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如何融入並對大學產生認同，往往是這些學生進入高等教育階段之後經常遭遇的難題。例如，阿成雖然考進號稱「文組第一」的台大財經系，但家世和文化資本的落差，讓他在進入大學之後感到相當地疏離，經常懷疑自己考台大的意義為何：

「系上很多人，他們家可能就是金融家族，爸爸是在什麼證卷工作銀行工作，或是什麼教授，所以他們其實大家成績都非常好，就是很會讀那些東西…很多同學很明白我以後就是要在金融業工作，所以他們進來讀書他們就是一直往那個方向前進，他暑假就會去銀行或相關的單位實習，然後大四就開始工作幹嘛的，就是目標很明確，然後現在都已經在賺大錢了，像我只是成績好考進去的，然後也不知道在幹嘛」

小業也跟我說道，過去的教育養成經歷，讓他在進入大學之後，常常不知道該如何跟老師相處：

「我有時候都不太知道要怎麼做，因為我從小就是在公制的教育底下長大的，從小就是公家的導師跟我們這些學生之間的關聯，然後評價我們就是分數…所以我到大學裡很不習慣就是，為什麼會整天去纏著老師，跟著老師到處跑啊，或者是一直跟老師聊天，我就會覺得到底為什麼這樣做」

除此之外，大學重視人際交往的特性導致原本被「分數」所掩蓋的階級污名變得無處躲藏，也讓他們融入社群愈加困難：

「台大我覺得蠻多一群人是很難想像，就是你家裡在賣菜，你們家沒有那麼富有的狀態是什麼。我覺得很多都是理所當然的，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很難想像的，可是我也不會想特別跟人家說，是因為講了你好像在跟人家講說我很可憐，所以你們要幫助我，我覺得這不是我…所以我沒有特別想跟人家談到這一塊。」

制度評價方式的轉變，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們在競爭上的優勢，家庭在階級條件上的侷限，也讓他們找不到可以諮詢和仿效的對象。回顧他們的過去，他們雖然在家庭中獲得基礎的養育，但是在教育方面卻是毫無奧援，儘管學校教育一定程度彌補了家庭在教育上的不足，但依舊無法替代家庭，在文化上擔任銜接、傳承的角色。也是因為如此，這些工人階級學生即便取得不錯的大學學歷，也不曾「真正」成為菁英大學生的一份子，反而像是誤闖大學的局外人，在進入大學之後感到不得其所、格格不入。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文化困境不僅沒有擊敗他們，反而還成為他們的滋養，使他們更加深信「凡事靠自己」的信念，習慣在人際上採取自我孤立的姿態。這樣的姿態一方面強化了他們既有的慣習，但另一方面也試圖在既有慣習的框架下

尋求變化和出路。或許也是因為如此，在談到他們是如何應對自身的困境時，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把唸書當作自我轉化的出口。小業告訴我，他上大學後最大的興趣就是閱讀，平時只要有空他就會跑到圖書館念書，一直待到晚上才回家。由於大部分的時間都投注在學習上，他幾乎沒有額外的社交和娛樂：「我可以一直待在圖書館，可以每天就看不一樣的書把每一本書都看遍…而且我什麼書都可以看，如果我有那個命」。阿成也是一樣，他自從認清自己不適合念財經，便開始大量地選修外系的課，嘗試藉由拓展視野來重拾自身的興趣：

「我修了超多有得沒得科系，我還去修了什麼創業創意學程，去物理系修課，去戲劇系修課，我也去上資管系的課，我就是到處去上課，然後想說能不能找到一個我覺得，就像現在人家講說，你要做一個你喜歡的工作或興趣，你就是透過一直去修課，去接觸不一樣領域。我就想說可能可以找到一個我想做的事情」

至於人際關係，他一點也不在乎，只要能夠「做自己」就好：

「我大一就是蠻怪的，我大一就會染金頭髮阿哈哈，我就穿背心跟掉嘎去上課阿，ok，反正我就是你們眼中的鄉下人嘛，那就是做最舒適的自己那種哈哈，然後我去上課我都坐最旁邊阿，然後做自己的事情阿，因為我就覺得沒跟他們互動也還好」

雖然這樣的策略可以被視為他們能動性的展現，但也從來都不曾超越他們過去走過的路徑。

大學畢業之後，他們都沒有放棄繼續深造，但是有關未來實際會如何，他們則大多沒有肯定的計畫和想法。小業因為知道自己不適合跟人交涉，他選擇貸款到美國念資訊工程，理由是這個領域「只需要處理物，不需要處理人」。阿成則是為了追夢，先是從事自己有熱情的廣告業，不過因為擔心養不活自己，最終轉戰薪水較高的科技業。生活的焦慮始終糾纏著他們，並沒有因為名校畢業獲得徹

底的解決，「翻身」對於他們而言也只是一個意義含糊的想像。但是回顧自己的過去，他們都展現出十足的自信和驕傲，因為他們知道，這已經是他們能走得最遠的路，榮譽和糾結同時存在於他們的內心，亦是他們持續下去的動力，他們的韌性，就如同 Sayer (2008) 所言：「以身為工人階級而自豪，是有道理的，因為與他人相比，工人階級身上沒有一切不應得的好處，從而佔據了道德制高點 (moral high ground)；與那些環境優渥的人相比，工人階級的功績與內部益品並不是來自於自身或繼承，而是在更艱難的環境下獲得的…」(Sayer ; 2008 ; 182)。

二、雙重劣勢的屈從者

(一)、權威式的教養

若是就經濟條件來說，小傑就跟倖存者一樣，在家庭收入方面極為困窘。小傑的父親在他剛上國小時便丟掉了原本在化妝品公司擔任業務的工作，而且因為長期謀職不順，很早便放棄尋找穩定的就業和收入。從那時候開始，家裡的生計，除了偶爾依靠來自爺爺奶奶提供的支持，其餘家中四人大部分的財源，平時都是靠母親一人擔任牙助的微薄薪水來支撐。因此，自從他懂事開始，向來都是媽媽在外面賺錢養家，父親則是扮演家中的主要照顧者，負責帶他跟妹妹。

但是跟倖存者不同的是，小傑的父母並沒有因為相似的階級條件而同樣對下一代採取自然放養的態度，特別是他的父親，自從沒有了工作後，便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在教養孩子。但是這樣的介入，對於小傑的童年卻不見得是好事。在小傑看來，父親是個控制慾極強的人：

「什麼事都他決定，包括買一天三餐吃甚麼，然後也都是我媽去煮，至於食材從哪來，他都貨比三家吧，主要是很省，大概就是拿個三本大賣場那種書，去比同一個東西，這家是多少錢那家多少錢，比對最便宜那個就把他圈起來然後記錄下來，然後包括就是算一算打折後是多少，他沒工作啊，所以他不得不」

由於長期陷於貧窮的困境，他父親的個性非常暴躁，而且因為對孩子放不心，他的父親對於小傑特別嚴厲，幾乎什麼都要管。除了在生活方面嚴格控管他的作息，規定他不能在學校亂交朋友，不准他有獨立玩樂的時間：「我沒辦法出去玩，你說跟同學出去，沒這回事，我以前從來沒這回事。」對於他平時的言行舉止也格外要求，不容許他有絲毫的犯錯，由於父親的管教方式相當傳統，被打被罵幾乎是小傑習以為常的家常便飯：「只要說錯一句話，就會感覺到有一雙眼睛在瞪著我，就知道我死定了」。在教育上，父親也對小傑格外嚴厲，對他在學校的表現有很高的期望，不僅要求他在班上的名次必須維持前三，也常常親自在一旁管他唸書。也是因為如此，小傑雖然從來都不喜歡讀書，但回憶小時候，「眼睛張開就是書本」：

「就被逼得阿，我爸在旁邊開始一個一個陪我看…帶著我把參考書念一遍，然後問我那些重點有沒有背起來，會考我，然後題目開始寫，假設是錯得很刁轉的題目，他就覺得還好，但是錯得很基本的題目我可能就要挨拳」

由於從小被父親一路打到大，他顯得相當的自卑，不僅經常自我否定，也習慣順從和妥協：

「我其實是個很厭世的人，看任何事情都是負面的，我不敢說我是生下來是這樣，但至少後天是佔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吧。從以前就是，日子過得很痛苦，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辦，這樣一路熬到大，也越來越扭曲」

誠如鄭英傑（2017）所說，在華人「唯有讀書高」的文化脈絡下，工人階級的父母有時為了「脫貧」或「爭面子」，可能會將自身遭遇的苦悶經驗（例如失業、輟學等），轉換成一股「反再製」的心態，並積極地投射到下一代的身上。但很顯然的，這種教養方式對於工人階級學生來說是相當矛盾的。

(二)、建立與學習成就的關聯

若是從教育翻身的角度來看，父親的教養確實帶來了「正面」的作用。小傑的國中是按照學區分配，直接於鄰近的公立學校就讀。然而，由於學校在當地的聲望較差，因此整體的學習風氣其實並不理想，班上的同學大多是成績「吊車尾」的學生，不但愛玩也討厭唸書：「我國中是被分配到最爛的一班吧，不是刻意分配，而是剛好最爛，因為好像放牛班吧，有那種下課後喝醉酒，你知道○○○吧，反正就是一家大百貨公司，我們班就有兩個女生醉倒在○○○被抬回學校，超誇張的阿」除此之外，打架、鬧事的事件在班上也是屢見不鮮，這也讓學校的老師們非常頭痛，經常將他們班視為「麻煩」：「很多同學是會嗆老師，我記得，國一升國二的時候，我國一那個班導要去進修，所以我們班導是要換人，可是沒有人要接我們班」

然而，礙於家裡資源有限，小傑的父親「沒有那個條件」讓他跨區就讀或尋找更好的學校，就近就讀的機會是小傑唯一也最為「合理」的選擇。不過，從升學的角度來說，這似乎也不完全是壞事，因為正是透過這段經歷小傑才有所成長，並逐漸體會父親從小管他的用意。

正如先前提到的，小傑對追求成績其實並不是那麼熱衷。畢竟在他看來，會唸書也只是被「逼」的，沒有任何的意義。所以，儘管他從小的成績表現並不差，他也不曾像倖存者那樣，對自身的成就感感到榮譽和驕傲。可是這樣的心態卻在他進入國中之後產生了不同的變化。尤其是周遭同學帶給他的刺激和衝擊，使他逐漸認識到「有沒有唸書」的差別。例如，同學時常會因為他外表看似「文弱」好欺負，在班上排擠他、笑他，這使他在同學之間總是顯得格格不入，也難以融入：「我既不會打架也不會吵架，應該說以前我爸那種管教方式，讓我算是喪失這兩個能力」而另一方面，父親從小對他的嚴厲管教也讓內化主流的教育思維，讓他瞧不起身邊這些「愛耍廢」的同儕，認為他們跟自己不同：

「他們就是個痞子，他們有沒有混黑道我不知道，就是常常講到什麼少年

犯罪，可能會吸食毒癮，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這類型的，我覺得看起來就很像，有染頭髮的，下課會上夜店的，反正就是，說難聽一點就是不良少年跟少女，我國中那班裡面一堆這種」

正如 Ingram (2009) 提到的，工人階級學生若想追求自身在教育上的成功，往往必須跟自身熟悉的文化環境維持適當的距離，並且在自我和他者之間進行認同的劃界和評價 (Ingram, 2009)。因為唯有透過這樣的劃界過程，他們才有辦法，進而跳脫「階級再製」的魔咒。

或許正是受到這樣心理動力的驅使，國中時期的他不僅變得相當看重唸書，對於父親平日的規定和要求，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容易感到剝奪和不滿。除此之外，他也發現，在越是不利的情況下，父親嚴厲的作風反而帶給他「安全感」，讓他更有自信去克服眼前的困難。事後證明，聽父親的話並沒有讓他吃虧，因為他不僅在最後畢業時獲頒校內局長獎的殊榮，同時也成功考上心目中的理想高中：

「對我來說，我（那段時間）只要下課時間就在唸書，在家裡也在唸書，所以才勉強這樣生存下來了。到高中就不一樣，我那間學校 pr 值九十五，進來的人原則上不會太差，跟國中比起來，我國中那群全部都要念高職的」

因此，不同於 Willis (1977) 筆下的工人階級子弟往往將反叛學校的行為視為繼承父輩的標記，相反的，小傑的經歷，反而讓他得以將父親過去的身教言教加以內化，並最終選擇了一條相對「安全」、「順利」的階級之路。

(三)、大學，走下坡的開始

儘管如此，隨著小傑依循著同樣的路一路往上爬，原本因為追求成績而被忽略的階級劣勢，如今也跟著一一浮現。單就資本獲取的社會條件來看，小傑其實跟倖存者無異，同樣是藉由考試和讀書的後天努力，一步一步地突破工人階級

「教育失敗」的結構命運。他確實也不曾讓父親失望，成功考上了第一志願的清大。可是，考上理想的學校實際上並沒有替他帶來自信和榮譽，反而像是在「走下坡」一樣，一而再地打擊他努力求變的信心。

例如，上了大學後，他發現自己「好像做錯事」，成績怎麼唸就是跟不上同學，總是擔心被別人拆穿、發現自己是「草包」：

「我進去是被電的，因為我念書是靠時間堆出來的，那些人是本身就很厲害了，時間堆出來真的有限。一天不可能有四十八小時，他們可能花六個小時就可以把我 ko 掉了，真正聰明的人是這個樣子，能考進清大的大部分都這些人」

而且因為從未體驗過自由的滋味，跟不上學校的步調反而讓他「開始沉淪」，不再追求成績，只想把以前被剝奪的人生，全部「給它玩回來」。但話雖如此，小傑跟我表示，他所「玩」的，其實只是窩在宿舍打電動，因為他沒有培養什麼興趣，也不曉得該如何規劃自己，而且在最重要的人際方面，他發現自己「就是沒有辦法跟人交流」，因為「從小就是放學之後就只能被要求回家念書，讓我到後來越來越不會玩」。雖然在小傑的心中，做為一名「合格」的「大學生」必須要「全方位」的，「除了要會念書，還要懂得交朋友，甚至是交女友」。但是上了大學才知道，這樣的期望實際上是過度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因為他「(大學前)除了念書以外，其他地方全部都放棄了」：

「怕他們看出來我其實…我肚子裡是沒東西的，我平時就是當個宅男，我肚子其實沒有東西，問我去哪裡好玩，我不知道，哪裡有什麼好吃的，我不知道，最近有什麼電影好看，我更不知道(儘管自己深知交友的重要性)但我也沒去做這件事，我完全沒去玩社團，因為這件事我做不起來」

雖然畢業之後，他因為心有不甘，想嘗試透過繼續升學來挽回過去的成就，因此努力考上台大的研究所，但四年下來的研究生活反而讓他感到自己一無是

處：

「感覺有那段跟沒那段是沒有差的，我覺得說我碩士班念的這四年，反而是在走下坡阿，肚子裡的墨水漸漸漏光了，然後腦袋裡的，腦袋裡的東西也被掏空了，你把腦袋比喻成一座機器的話，它就成一台生鏽的機器一樣，你就只能看它生鏽，然後你想要把它啟動，但啟動不起來」

回顧自己的狀態，他很清楚自己的困境為何，但他也不曾尋求改變，也無力改變。很顯然地，受挫並沒有讓他更堅強，反而還強化了他自卑的心理：「（相對其他人上大學改變很大）而我卻是沒有，改變最大或許有拉，曾經獲得一段自由的日子，但獲得自由後不知道要怎麼生活」。



伍、再製優勢？中產階級的「典型」和「例外」

在這一章中，我將以中產階級兩種不同的教育軌跡類型來說明中產階級維繫優勢的邏輯。我將中產階級進一步分為「繼承人」和「自由人」兩類，說明他們各自家庭教養如何影響他們日後的發展和自我認同，以及這些認同跟制度的關聯。菁英大學中產階級跟工人階級學生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不需要向上翻身，只需要維持既有的優勢。但從這兩個類型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各自面臨優勢維繫的不同困境和因應策略。

一、傳統典範的繼承人

(一)、形塑成功的樣板

繼承人的家長大多擁有高等教育的背景，從事的職業（教師、經理等）對於學歷和專業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往往極度重視學歷成就，從小就給予下一代很高的教育期望。例如，泡泡跟我提到，她的母親在她還小的時候就會不時告誡她：「你不讀書，成績這麼爛，你以後去當清潔工怎麼辦，你以後想去當清潔工嗎？」從小到大，只要她稍微不聽話或沒能符合父母的心意，就會被父母貼上「叛逆」的標籤，所以，即便她覺得自己不是讀書的料，也自認「沒甚麼企圖心」，但卻習慣順從父母安排，屈從「現實的那一面」。阿俊也提到，父母小時候對他和哥哥都「抓蠻緊的」，無形的壓力總是會讓他不敢保有自己的想法，從小就養成比較聽話的個性：

「我要跟同學出去玩，他就會問說甚麼同學，同學是怎麼樣的？為什麼要出去玩？玩多久？然後就一直問問問問，問到你放棄，每次都覺得好像不應該出去玩…那種無形的壓力就會讓你自動卻步阿，好像不應該出去玩，我應該把書念好」（阿俊）

若是就價值觀來看，繼承人的家長其實跟屈從者的父親沒什麼不同，他們都希望能藉由學歷來保障孩子的未來。儘管在實際的做法上，小傑（工人階級）的父親礙於階級條件的限制習慣採取權威式的教養強迫小傑服從，中產階級的父母則因為擁有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所以除了訴諸價值，也能在實質的層面提供孩子有意義的協助。像是泡泡的父母雖然在外商公司的工作相對繁複，平時也經常出差、晚歸，但父母為了兼顧他們的學業，不僅替她跟兩個姊姊都請了私人家教，每個學期開學之前都會親自帶她去挑選講義和評量，熟悉上課的教材，假日有空的話，也會在家陪她聽英語教材，幫她複習英文，充分利用他們的親子時間。相較之下，阿俊的父母都是教授，是「八小時的」，「只要有課才要到」，因此更有條件在家陪伴孩子學習：

「他們會一直陪在我旁邊一直寫，直到你寫完。然後小朋友通常都不讀書，所以就一直拖一直拖，明明可以五分鐘就寫完了作業，就不會想花時間寫，然後就一直分心。我爸媽是教書的，所以他們對課業這種東西非常要求。所以小朋友、小學生下課跑出去玩啊，玩得天花地亂，我爸媽就會坐在我旁邊，要我把所有功課寫完。」（阿俊）

父母也會藉由傳授他各種考試的秘訣來傳遞特定的文化資本，讓他熟悉考試的文化：

「就會想辦法教你說，你要去思考，老師現在要考這段課文內容的時候，他可能會怎麼去考你」

相較於小傑的父親只能提供制式、僵化的協助（如，在旁邊盯讀書，但還是靠小傑自己理解），阿俊的父母因為都是教師，可以教導他如何銜接學校的考試制度，所以讓他從小就能理解怎麼在考試中勝出。這種標準化的教養模式雖然死板，但是有效，他們知道父母是為了他們好。也是因為如此，雖然這些中產階級學生不見得認同父母的價值，對父母的管教也大多頗有微詞，抱怨父母愛控制和否定他

們的想法，但是因為能獲得實質的幫助，他們也很難拒絕父母，在無形中習慣父母替他們安排的菁英認同。

(二)、學校教育作為家庭教育的延伸

正因為父母是他們與學校教育銜接所不可或缺的中介，因此即便在進入義務教育後他們在學校的成績表現都不錯，這些家長也不曾「放手」；相反的，家長們為了確保孩子不會落於人後，往往會運用自身的優勢直接介入下一代的教育過程，在背後替他們撐腰、擔任他們的後盾。例如阿容提到，她的母親在某間國小擔任主任，所以她的國小不是按照學區分配，而是在母親任職的學校就讀。因為媽媽在校內擁有較廣的人脈和影響力，所以每次抽籤「都可以黑箱」，替他安排校內不錯的老師擔任她的班導。即使後來她國中是在當地普通的公立學校就讀，母親也經常關注她在學校的生活，替她排除麻煩、解決問題，讓制度為孩子服務：

「國中有次印象超深刻，我早自習，那天就是真的早自習，沒有要幹嘛，所以我就想說看個書，但學務處剛好走過去，我的書就被沒收了。我回家就跟我媽講，我媽就說超級莫名其妙，跑去學務處跟他講說你幹嘛沒收我女兒的書，你們早自習又沒要幹嘛」（阿容）

阿俊則是認為自己的升學歷程跟父母脫離不了關係：考國中時，父母希望他能上北市頂尖的升學班，但他當時術科考試分數不足，沒能順利考上，父母便嘗試遷戶籍，「那時候是有遷戶籍到台北，但不是可以進○○的戶籍，後來不知道我爸媽是用什麼方法，反正就是把我弄進了○○」。後來高中進了建中，父母為了讓他能夠好好專心念書，也特別在學校附近買下一棟套房，用做他升學專用的臨時基地。

或許也是因為如此，這些學生在談到讀書時，多少也附帶著相應的責任感，這種心態一如阿容所說：「念書這件事情就是我的工作」。彷彿父母越是處心積慮地栽培他們，念書便越彰顯了他們在家庭中身為孩子的義務。因此，在回顧過去

的求學經歷時，比起工人階級學生往往會強調自己向上流動的艱辛，中產階級的學生則更常將話題聚焦於學業本身所面臨的挑戰。雖然在訪談的過程中他們總會不時強調追逐分數這件事情「很蠢」、「沒有意義」，但他們同時又相當習慣採取資優生的認同，將讀書視為一場值得甚至充斥樂趣的事：「我的興趣就是把這些東西背起來然後考試考高分，可以證明自己可以成績很好（笑）」（阿俊）。對於他們來說，為了什麼而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大人期待的樣子。換言之，菁英認同的背後，仍舊是牽扯著孩子對於父母的依賴。

（三）、上大學的意義

即便如此，這些學生雖然在升學方面得心應手，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於自己的生涯也擁有同樣清楚的認知。由於學習的目的純粹是功利性的，他們很少保有自己的想法，這導致他們在考大學時，也往往傾向延續主流的邏輯，順應父母或師長的安排。像是阿俊講到「我爸念電機，我哥也念電機，然後到我的時候，當然就會有壓力，就是你要想辦法去考到第一志願然後去念電機」。阿容則是相當坦白，她表示自己當時完全沒有任何想法，「就是想唸台大」：

我覺得就算是大學進去了以後，我也不知道以後要幹嘛，其實也是很迷茫，到考上大學之前，人家就是說女生第一志願就是北一，那好我就上第一志願，考大學第一志願台大，那好吧，我就念台大，沒甚麼自己獨立思考的判斷，別人說甚麼就是甚麼。系所我是用刪去法，我那時候就覺得我應該二三類無法，就選一類組」

雖然從文憑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路徑都十分平坦。這些中產階級學生就讀的科系都相當典型（理組的電機、文組的商管），其求學過程也很少有轉折和例外（不同於倖存者擁有轉學和跨領域的經驗）。但走在「正確」的成功道路上，並不意味著他們也必然懂得如何自處和適應。特別是到了大學，競爭的標準不再只是把書唸好就夠了，知道自己要追求什麼似乎更為重要，這導致他們往往感到不知所

措，不曉得該如何維繫學習的意義。例如，阿容有些感慨地提到，進入大學之後讓她有很大的衝擊：

「台灣的教育一直以來都是小學到高中你課表都是安排好的，它會給你一個很明確的方向，就是努力。小學到高中就是方法是明確的，目標也是明確的，你只要努力你就照這方向做，一定會有不錯的成果，但是到大學之後，我覺得它目標是不明確的，方法也是不明確的，你可以做很多，因為台大的選課是很 free 的，不像其他大學會幫你排說你一定要選，台大就是你想怎麼排就怎麼排，修課非常自由，你選課是全自由的，所以就是目標不明確，我到底要追求甚麼，我去追求一個系上成績好像沒有甚麼意義」

正因為大學是「很 free 的」，向來按照大人期望而活的她，反而因此失去了學習的動力，大學四年，她幾乎都泡在社團，不僅很少關注學業，也錯失實習和晉升的機會。因為難以借助學業來維持優勢的認同，他們往往在人際上感到不安和焦慮。例如泡泡跟我提到，她雖然社交上都很順利，在學校和社團都認識到很多「厲害的人」，但是因為不知道自己什麼，沒有方向和引導總讓她感覺自己有點不入流：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些自卑心，因為即便我考上了這間學校，可是大家都看起來這麼厲害，就有點像 social media 那種感覺，你覺得大家都過得很好，你知道你自己沒有辦法跟他們過得一樣好的時候，你就會開始出現一些退縮的機制」

正如 Lareau (2000) 所言，資本是否被啟動，對於中產階級的再製其實是至關重要的。這些學生雖然在過去藉由家庭優勢賺取了不少學歷資本，但始終沒能習得與資本對應的慣習跟自信，特別是在「聰明」的標準不再只是講究考試的情況下，他們往往不知道如何繼續把事情「做對」，也擔心自己名不符實、不夠資格。這也意味著標準化學習可能帶來的反效應：因為當人生只有學習的時候，上大學後

就容易失去方向、不知所措。

有趣的是，他們的父母大多在它們上大學之後便不再干預他們的生活，甚至反過來要求他們要長大為自己「負責」，像是阿俊提到：「他們到現在還在 denial 的階段，否認自己有幹過這種事，說沒有啊我哪有，你應該多跟朋友出去玩啊什麼的，但都已經大學，然後我都已經變得很孤僻了」但是從來都被安排的他們，突然間被要求獨立，反而使他們覺得相當無力。像是從小至洗衣服、打扮、談戀愛，大至重要的實習或求職的準備，他們都得從頭自己學習。但是因為欠缺大人的引導，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反而會採取半放棄的隨興態度，因為少了父母的壓力，他們似乎也沒有理由要在意，因此安於原本的地位，拒絕冒險，只求最穩定保守的路。這說明了傳統繼承人的困境。

二、超越升學邏輯的自由人

(一)、培養獨立思考的自主態度

阿尼是獨生女，從小就受到父母的愛護。她的父親是新創公司的老闆，熱愛攝影和音樂，擁有多元的興趣，母親則是專職在家的主婦，喜歡藝術創作，也曾經營過手工藝的事業。為了挖掘她的潛力，父母自小就非常用心的栽培她，讓她接觸各種才藝，因此無論像是鋼琴、柳琴、書法或畫畫課，她都有所涉略，從小就擁有許多興趣和嗜好。

跟繼承人不同的是，她的父母從來都不在乎孩子是否贏在起跑點，而是希望打造一個讓孩子能夠快樂成長的學習環境。從小到大，她跟父母的關係相當的平等，特別是母親，幾乎就像是她的夥伴一樣，不僅時常陪她聊天，也是她心靈託付的對象。例如，她談到小時候個性比較封閉，阿尼的媽媽特別細心：

「她每次就會給我一些指引，跟我說你應該要怎麼想阿，或是你要怎麼做之類的，她也會去觀察說我最近可能太封閉了，然後幫我打開一點，就像她在國小的時候，想要讓我開朗一點，我記得國小還有送我去參加什麼劇

團，想要讓我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一些表演的慾望，結果國中就變一個瘋子，她就希望我可以收一點，就是會根據小朋友的狀態去調整教育的方針，引導我的方向」

為了讓她有快樂充實的童年，母親不僅經常帶她出遊，鼓勵她參與各種藝文活動和展覽，放寒暑假的時候，也會為她規畫行程、設計專屬的假期活動。可是另一方面，母親也非常看重她的「生活態度」，從小就對她的生活有許多要求。像是在飲食方面會要她吃得健康，不准她亂吃垃圾食物，也不允許她隨便熬夜，對於她的作息有著嚴格的規定，同時也透過家事的訓練來培養她的責任感：

例如說本來要洗碗，可是沒洗，就洗一個禮拜的碗，曬一個禮拜的衣服，鞋子沒有放好…她就會把那些鞋子藏在家裡的任何地方，讓我拿不到…什麼東西沒有喝，她就那個東西放在馬桶上面，什麼東西沒有丟，她就那些沒有丟的垃圾放在我床上面」

也是因為如此，她雖然從小就享有豐富的資源，但在自由和紀律交錯的成長經歷下，反而讓她養成了自信又獨立的性格，不僅在看待許多事情時，不會覺得是「理所當然」，遭遇困難時也會習慣「自己去做」，「想要生活的步調是可以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母親雖然一方面作為她的夥伴，提供她快樂的成長經驗，但同時也是她的人生教練，從小就透過紀律的約束來厚實她的自主能力。就此而言，快樂成長並不是完全的放任和自由，而是全人教育般的自主學習和發展。

(二)、追求多元的教育經歷

在義務教育的初始階段，阿尼其實跟許多中產階級學生沒什麼不同。國小的時候，阿尼的爸媽也曾因為擔心原本學區學校「比較多混混」，所以透過遷學區的方式讓她進入位於「文教區」的明星學校就讀，可是她發現當時周遭的同學都很「勢利」，因此讀得並不開心。所以到了國中，父母為了讓她適性發展，沒有

繼續讓她就讀菁英路線的升學班，而是選擇放手，就近於家裡附近的國中就學：

「我們班都是很聰明，他們不是很笨，其實是很聰明，只是他們不想把時間花在唸書上，所以就搞一些其他有的沒的，像是大隊接力第一名阿或是布置教室第一名，但是成績就是倒數，那時候就玩比較多，也跟大家感情比較好」

對於學校課業，父母並沒有要求太多，只求她維持班上的平均，除此之外非常鼓勵她尋找自己的興趣。於是到了高中時，她報名了○○高中的人社班甄試，希望能及藉此拓展自己的視野。在那邊，她確實受益良多，不但很早就接觸到她喜歡的社會人文科目，也透過多元的課程安排，像是出國參訪、去原住民部落帶小朋友、參與名人作家的座談等，接收各式各樣的刺激。這樣的經歷，使她有機會提前思索大學的樣貌，並且在這個基礎上確認自己的需求。例如，她談到在人社營時，她有位同學的媽媽在資策會工作，跟她提到「圖資系很像一個工具，就是她可以讓你去拓展其他領域的東西」，這讓她覺得特別有道理，她認為自己什麼都能接觸，但不必在大學的階段就將自己給牢牢侷限，相較之下，圖資不受限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她對多元的嚮往，因此被阿尼當作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阿尼這樣的想法，在當時獲得了父母全力的支持，讓她覺得相當難得：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路上都不是很干涉我，我知道我周圍很多朋友的媽媽是，你要去給我上什麼法律系，因為周圍蠻多人的媽媽的確是會干涉，我媽就是非常的好，覺得我想要去哪就去哪，他們也沒有設定我一定要去台大」

但儘管父母沒有「設定」她一定要上台大，她還是想上台大。因為她明白，只有在擁有充份選擇的情況下，做選擇才有意義，而台大作為資源豐富的名校，事實上相當符合她過去所走的路徑：

「不是因為這間學校有多好，是因為它資源很多，其實我真的覺得它資源可以多到你真的可以好好利用，因為真的太有錢了，就是很多資源阿，圖書資源影音資源，系館什麼什麼的，然後可以認識周遭的那些人，就比較不是因為它是全台最好的大學，只是因為它的那些資源就是真的很不錯，所以想要去這個環境裡面看看」

因此，明顯不同於繼承人，往往容易受到父母社會價值的影響，只看到台大作為學歷文憑的功利性，阿尼則是從自身的需求出發，專注於大學教育作為內在益品（goods）的價值（Sayer, 2008）。毫無疑問的，父母的支持和教養對她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她既有資本，也有自由。

（三）、歷經冒險的成長和回歸之路：

或許並不令人意外，進入大學後，阿尼就像是如魚得水，特別融入大學的生活。雖然在學業方面，她自嘲自己不是一個「好學生」，不但成績很差，也經常翹課。不過弔詭的是，她也跟我強調她其實「很喜歡上課」，她在學期間的修課數甚至超越了畢業門檻的規定。對於修課的意義，她有自己的一套見解：

「我荒廢的是我們系上的，但是有一些很特別的課我會去上，例如說，戲劇系有那種做模子的，做道具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手做成一個模子，就覺得很有趣，或者是什麼地質調查，有點像戀愛巴士那樣就是大家一起去一個地方然後去採化石，就覺得很好玩，特別好玩的課我就想要多上，還有那種電影概論它教得很好，就是它講一些蒙太奇，就是有一些課比較有意義就會去上，阿我修了非常多語言，因為台大就是語言的課就是很棒，不用錢，然後老師又很好，我有修日文，荷蘭文還有韓文，因為有興趣」

在社交方面，她也不缺有趣豐富的經歷：

「我整個大學四年都在辦活動，就是各種活動都辦，系上也有社團也有，也有當過班代也有，因為國樂社有很多活動嘛，國樂社的朋友從大學到畢業都還有辦音樂會，然後學也有台大藝術季阿，新生書院阿，然後也有畢業舞會，我們那一屆的畢業舞會是我布置的，我當美宣布展，還有系學會什麼的，很多東西」

相較於繼承人上了大學後往往會擔憂自己無法迎合大學的步調，不知道如何延續自身的優勢，阿尼則是早就習慣為自己而活，也清楚知道自己想追求什麼。一如 Prieur & Savage (2013) 所指出，當代新興的中產階級大多已不再是透過單一的標準來進行菁英的識別和劃異；相反的，個人是否有能力在不同的競逐典範之間自由移動和穿梭，其實遠比追求傳統的成就更為關鍵。很顯然的，阿尼因為不曾受到傳統升學邏輯的約束，因此特別契合大學「自我探索」的文化，也不必為了滿足特定優勢而感到焦慮，害怕自己跟不上主流的標準或是被他人取代。

但儘管如此，這不表示她沒有擔心過自己的未來。阿尼跟我說，畢業之後，她對於未來其實有點「茫然」：「不知道我志向是哪裡，到底要在哪裡工作，我到底要做什麼」。她發現過去許多原本人生選擇顯得單調、「無聊」的同學，對於未來似乎都有明確的打算和規劃，這讓她感到有些危機。但是在過去受自我主宰的慣習驅使下，她沒有立即屈就於主流社會的安全道路，而是覺得應該冒險，「找回自己根本喜歡的東西」。為了挑戰自我，她報考了○大的藝術研究所，希望能藉由自己有興趣的藝術來發光發熱，找回屬於自己的熱情。但就在開學的第一天，她被系所的氛圍給深深地震撼：

「一路求學以來我都沒有覺得，你問我台大第一天或者是○○第一天，都沒有特別大的文化衝擊，都只是去認識新的朋友，那種感覺，但是我去○大，就是真的衝擊。因為，那邊裡面的人，不是我以前舒適圈的人，那邊的人的背景非常複雜，唸藝術的人有各種各樣的家庭背景，也有人是不幸福的家庭抒發到他作品上，也有離家出走的人，就是各種叛逆，那邊的人的背景，一些想法，甚至連老師上課的內容，是以前完全沒有碰觸到的，

就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

由於沒有真正跨出過自己的「舒適圈」，阿尼第一次體驗到她過去所不曾經歷的「多元」和「差異」，也意會到自己與身具來的、不同於那些「叛逆」他者的社會屬性和定位。這種情緒是複雜的，她一方面對眼前的一切感到興奮又「新鮮」，但同時也發自內心地感受到自己的陌生和格格不入。這份不安的體悟彷彿是一種警訊，喚醒了她過去自律的一面，階級的理智讓她細數自己在這個領域的未來，也清楚自己並不適合繼續待在這個看不見未來的「圈子」：

「系所的老師都是那個圈子的人，所以你大概知道你如果以後念下去，就是跟他們以後出去工作會變怎麼樣…這個圈子裏面的人跟我就是太不一樣了，成長背景還有一些價值觀都不一樣，我實在是無法為了藝術打破，我覺得藝術不應該是要破壞我原本價值觀的東西，比如說，我不可能為了藝術去嗑大麻，或者是吃檳榔，或者是一定要反資本主義之類的，我就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在知道這條路走不通之後，她決定馬上休學，並且在短短三個月內，申請去英國讀書。但回國之後，她也沒有要從事自己有興趣的工作，而是選擇在薪水待遇都相對穩定的科技業求職、磨練。回顧她的過去，她開始可以理解過去其他同學都在追求什麼，也承認主流價值的意義：

「我覺得我以前蠻不實際的，我以前不會特別覺得說，賺錢有多重要…可是，就我覺得從英國回來，可能開始要走入社會那一陣子真的變得很實際，應該說就是，你有走到反面過，你會慢慢知道怎麼樣是適合你的，你會知道怎麼樣才會是你想要的生活方式」

相較於繼承人是採取穩定安全的路徑一路向上爬，但總是焦慮和沒自信，阿尼則是透過有限度的冒險，不斷反思、階級校準、走一條相對舒服而安全的路，同時

在符合遊戲規則與充分發展自我特色之間，努力找到成功的平衡。正是這樣的姿態，讓她可以一邊享有中產階級的優越，但又不犧牲自我的幸福：

「我的人生都沒有很完整的規劃，我都在當下很知道我要做什麼，可是我不會在當下就先訂好我之後依定要做什麼，可是我再到了一個 moment 的時候，我就會做一個決定，然後我做那個決定以後我就不會後悔，我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做的任何決定」



陸、討論與結論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嘗試透過比較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學生從小一路唸到菁英大學的不同經歷，探討不同階級子女複雜的生涯建構歷程及其可能伴隨的（不）預期效應。本文發現：不同階級家庭在結構條件上的差異，依舊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他們不平等的升學路徑（工人階級雖然也可能進入名校就讀，但卻要付出比中產階級更多的代價跟努力），但階級位置相近的學生也可能會因為不同的家庭教養和求學經歷，在進入大學後形成不同的處境和發展。藉由訪談不同階級學生的經驗，本研究歸納出**倖存者**、**屈從者**、**繼承人**和**自由人**四種教育軌跡。我們可以將他們的軌跡概括如下：

表 ii、不同階級學生教育軌跡

	類型	（大學前）成長模式	大學後
工人階級	倖存者	順其自然成長	社交孤立但榮譽進取
	屈從者	填鴨式教育	自卑挫折
中產階級	繼承人	強勢資源挹注	因失去定位而不安
	自由人	多元支持	如魚得水

透過本研究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能進入菁英大學的工人階級學生，其經歷大多是相對獨特（對比多數家庭環境更加弱勢的工人階級）的。在階級劣勢的情況下，他們的翻身往往不是高度仰賴個人的能力和天賦，便是必須透過父母強制的介入才能彌補自身在先天條件方面的不足。其中，**倖存者**之所以能夠翻身，可以說是相當仰賴他們的個人特質和運氣。他們從小就因為有限的家庭資源，很少獲得父母的協助和支持。由於家長對於養育子女大多是採取「順其自然」的態度（Lareau, 2002；藍佩嘉，2014），他們必須學會如何獨立自主的生活（如阿成

：「我小時候都是一個人在家讀書然後看電視，就是完全是自主學習的」)，在教育上也更加依賴學校體制的支持。不過從小就擅長唸書的特性（如小業「我就覺得其他同學反應很慢，我就會先講答案」），讓他們在進入學校後大多享有正面且順遂的教育體驗，也對自己的未來抱持著自信。由於憑藉個人努力來爭取成功，往往能獲得社會的鼓勵和認可，這一類工人階級學生通常具有較強的自尊和階級榮譽感（Sayer, 2008），也更容易秉持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理想，與主流的教育體制建立有意義的聯繫；相較之下，同樣出身工人階級，**屈從者**的翻身則是跟父母息息相關。誠如鄭英傑（2017）所指出的，這種形式的翻身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階級家長在弱勢條件下的能動性，尤其在台灣重視讀書的文化脈絡下，家長很可能會基於「脫貧」或「爭面子」的心理，將教育視為一種「反再製」的手段，因而對下一代託以寄望和重負。但是透過小傑的故事，我們也發現工人階級家長在欠缺文化資本支持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因為採取過於極端的管教（例如剝奪和限制其人身自由、以打罵來要求孩子上進），反而容易在無形中加劇升學主義的缺陷（「眼睛張開就是書本」），讓孩子處處受限，欠缺自主發展的機會。也是因為如此，此類的工人階級學生雖然也可能透過努力升學取得向上翻身的機會（如果沒有半途而廢的話），但是在高度侷限的情況下，他們往往沒能像倖存者一樣，對於自身的成就感到同等的自信和驕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翻身途徑的差異似乎也讓不同經歷的工人階級學生發展出不同程度的韌性，傾向以不同的應對姿態來面對大學的困境和挑戰。針對工人階級的社會翻身，過去已有許多研究（Friedman, 2014, 2015; Aarseth, Layton & Nielsen, 2016; Curl, Lareau, & Wu, 2018）指出，階級翻身的過程並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結構位置的轉變，它同時也涉及文化融入和適應的問題。尤其是階級的污名和文化落差，往往讓工人階級學生即便能順利地取得大學的文憑，也容易因為社會疏離而難以融入校園的社群（Keane, 2011; Jin & Ball, 2019; Scherer, 2020）。倖存者和屈從者也不例外，出身弱勢讓他們大多在進入大學後皆遭遇到因翻身帶來的「階級傷痕」，但是不同的成長經歷也使他們在面對困境時，傾向採取不同的回應：倖存者大多因為不知道該如何應對菁英場域的遊戲規則（例如，不知道如何跟老師互動、打入中產階級為主的菁英圈），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像是大學

的局外人。但是這樣的困境反而激發了他們自我防衛的機制，不但鞏固了他們「凡事靠自己」的傾向，也使他們更加投入自我的精進和學習；相形之下，由於屈從者的成就從來都是父親「逼」出來的，因此對他來說，大學的挫折（社交困難、學業失敗）反倒像是難以超越的障礙，一而再地確認了他注定「失敗」的宿命，讓他不僅在階級上受挫，同時對於自我也顯得極度脆弱和自卑。這樣的差異再次提醒我們工人階級追求翻身的風險。因為他們要碼必須有點運氣，恰好擁有體制認可的天賦，能憑藉個人的力量來應對結構的挑戰；要碼則是得犧牲大半的童年和人生，但依舊再製自身的侷限。雖然從宏觀的角度來說，他們都取得了多數工人階級難以想像的成就，然而，階級依然在很大程度限制了他們「成功」的範圍和方式，並不因為他們翻身而有所改變和撼動。

與上述的工人階級不同，中產階級學生的升學路徑則是平順得多。他們大多從小就享有許多從家庭承繼的優勢，因此在銜接教育的過程中，往往不需要克服原生家庭跟主流教育的落差。「上（好）大學」對於他們來說，既是生涯規劃的目標，也是理所當然的現實，這樣的認知差距很大程度反映了他們跟工人階級的不同。但儘管如此，本文也發現，中產階級的父母其實不見得都像 Lareau 所觀察到的，對下一代總是採取「精心擘劃」的教養方式（Lareau, 2002），相反的，家長們往往會因為採取不同的價值取向（藍佩嘉，2014），在教養上對孩子的成長施予不同的側重。例如，**繼承人**所遵循的即是典型的菁英再製邏輯。他們的父母為了培養孩子的競爭力，從小就對下一代的教育特別要求，不僅積極地培養孩子讀書的能力（如阿俊：「他們會一直陪在我旁邊一直寫，直到你寫完」），也經常直接介入他們的教育選擇，替其排除就學障礙、並規劃各種有利的安排。作為資源的直接受益者，這類中產階級學生雖然不見得會認同父母的一切想法，不過因為從小到大大事事都依賴父母，他們很少保有自己的想法，也習慣聽從大人的安排，也是因為如此，他們往往在進入大學後，反而因為少了父母的引導，容易失去自我的方向感，也因為不知該如何持續把自己「做對」，經常感到不安和焦慮（如阿容：「我到底要追求什麼，我去追求一個系上成績好像沒有什麼意義」）。雖然他們不曾像工人階級一樣在人際上受限，但是對於自我的定位，卻始終提不起自信，顯得相當迷惘和無助。相較之下，**自由人**則是在「全人教育」式的環境下長

大。阿尼的經驗似乎代表了中產階級最理想的一面：這一類的中產階級學生不僅享有豐富的家庭資源，同時也獲得父母充分的支持和愛。父母從小就賦予他們適性發展的空間，讓其得以自我探索，透過多元的學習來發展自身的需求（「送我去參加劇團，讓我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對於升學的選擇，父母也給予他們完全的尊重，甚至鼓勵孩子追隨自身的興趣（「我想要去哪就去哪」）。也是因為如此，他們不但在大學中過得如魚得水，擁有許多興趣和規劃，能充分利用大學的優勢。畢業後，更是勇於冒險，積極建構自己的生涯（「我都在當下很知道我要做什麼，可是我不會在當下就先定好我之後一定要做什麼」）。

由此可見，在台灣的升學教育體制下，似乎除了同時具備經濟和文化優勢的中產階級學生（亦即**自由人**）才有辦法跳脫制度的束縛，並且享有學習和實踐自我的機會，其餘的學生，不論是出身自中產階級或工人階級家庭，很少有人能在追求「成功」的同時也能全身而退，不須承擔制度所帶來的代價和傷害。儘管如此，中產階級學生困擾的是如何在滿足成功標準的同時，也能活出多元豐富自我；工人階級學生則往往擔憂如何在實現「教育翻身」理想的同時，也克服自身階級的差距。很顯然的，階級的差距，並不會因為制度的作用而產生「趨同」的效果，不同階級的學生在不同的資本條件底下，仍然有著截然不同的運氣、機遇和人生。

二、理論反思：贏在起跑點就夠了？

透過上述的經驗，我們可以總結出兩點反思：

首先，資本也是需要社會化的。雖然不同家庭在資本條件上的落差，依舊是階級形成的重要基礎，但是個人從小養成的自我認知和文化能力，也可能會影響資本傳遞在個體層次的效果，使其形成不同的動力和樣態。為了辨識階級內部可能存在的差異、不一致或矛盾，我認為有必要在分析上將家庭內的階級再製進一步區分為「**世代傳遞**」跟「**文化繼承**」兩個面向：前者涉及家長對下一代在物質利益上（包括經濟、人脈或是透過教養傳遞的文化技巧和知識）的傳承；後者則是關係到上述過程對個體的文化影響，涉及資本實際社會化的方式（**way of transformation**）。若以「世代傳遞」來論，原生家庭在資源上的支持（或匱乏）確

實很大程度會界定個人在結構上的基本處境（正是基於這樣的條件差異，我們發現中產階級學生更容易進入好大學；而工人階級學生即便能成功教育翻身，也往往必須承擔相應的代價和風險）。然而，若是進一步考慮到個體後續的生涯發展，「文化繼承」則似乎更加關鍵，因為在不同的成長環境下（例如，成長於威權或民主的家庭），行動者對資本採取何種意義理解、能否順利習得與資本對應的素質和能力，也可能會對個人的再製形成不同的效果和形式。

其次，這些學生在大學中的轉變也再次突顯了制度的重要。學生在不同階段的轉換差異，顯示了資本在不同制度脈絡下的特性。除了慣習的中介，資本的制度脈絡也很重要。由於台灣教育體制在制度上的矛盾，階級的再製（或翻身）過程也附帶了許多不確定性。也是因為如此，不同階級學生，伴隨其不同的家庭教養和教育經歷，往往會在進入大學後遭遇不同程度的困境。在本文的案例中，似乎只有同時握有資源和自主能力的學生，才能在獲取高學歷的同時，能免除制度的壓力和代價。

我認為，只有完整地檢視資本、慣習以及制度如何互動，我們才能更好地掌握個體的階級繼承和生涯建構。

三、研究限制：

由於本文首重的是個案生命史的深度挖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樣本的多樣性，特別是因為只聚焦成功進入頂尖大學的學生，本文也沒能進一步探討反面的例子（例如，後段私校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學生），因此難免有過度簡化的嫌疑。但本文的用意，從來都不在進行一般化的總結和推論，而是希望能藉由個案經驗的爬梳來辨識個人生涯打造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機制、條件跟趨勢。由於國內目前仍然少有從生命史的角度分析個體再製的歷程，希望後續的研究者未來也能參考這個面向的分析，投入更多的洞見。

另外，礙於限制，我也沒能進一步探討職業生涯和他們學習生涯的聯繫，由於隨著學生成年進入職場，因面臨的人生議題不同，其自我價值、現實承受度、親子關係也都會產生質性的變化，而且職業場域跟學習場域也不見得會遵循同樣

的邏輯。這樣的不同究竟會如何影響個人的慣習，我認為是值得探究的。

呼應上述，性別的分析也會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性別的特殊性，是因為他跟階級一樣，是從個人出身即開始存在（財產分配、教養方式、社會期待）而且會隨著年齡增長越顯其影響力（例如，婚配而影響學業和職業安排）的社會屬性。然而，本文由於只聚焦階級生涯的建構，沒能對學生間性別歷程的差異給予同的關注，倘若能進一步考慮性別對階級生涯的影響，亦相當重要。



柒、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孫清山、黃毅志（1996）。補習教育、文化資本與教育取得。《台灣社會學刊》，19，96-137。
- 林大森（1999）。台灣地區家庭背景對中等教育分流的影響：「高中／高職」與「公立／私立」差異的探討。《東吳社會學報》，8，35-77。
- 翟本瑞（2002）。家庭文化資本對學校教育影響之研究--以農業縣山區小學為例。《教育與社會研究》，4，181-195。
- 駱明慶（2002）。誰是臺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113-147。
- 謝孟穎（2003）。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關聯性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49(2)，255-287。
- 李文益、黃毅志（2004）。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學生成就的關聯性之研究—以台東師院為例。《台東大學教育學報》，15，23-58。
- 楊怡蓉（2005）。不同社會階級學童學習習性及成因剖析之研究。國立台南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班士論文，未出版。
- 張建成、陳珊華（2006）。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的階級差異：兼論家庭、與學校文化的連續性。《教育研究集刊》，52(1)，129-161。
- 許殷宏（2006）。能力分班中的階級問題。《課程與教學季刊》，9(4)，101-118。
- 林郡雯、張建成（2008）。不同階級國中生之文憑意象的探究。《當代教育研究》，16(4)，199-235。
- 周新富（2008）。社會階級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以家庭資源為分析架構。《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1)，1-43。
- 林俊瑩、黃毅志（2008）。影響臺灣地區學生學業成就的可能機制：結構方程模式的探究。《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1)，45-88。
- 陳怡靖、黃毅志（2011）。學科補習、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高中多元入學。《教育研究學報》，45(2)，87-111。
- 趙珮晴、余民寧、張芳全（2011）。探討臺灣學生的自律學習：TEPS資料的縱

- 貫性分析。《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6)3，151-179。
- 王雅玄、陳靜盈(2012)。多元升學制度下的菁英生產：貴族習尚的學校實踐。《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2(2)，85-122。
- 朱俐嬛(2013)。不同社會階級學童家庭教養行為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黃銘福、黃毅志(2014)。台灣地區出身背景、國中學業成績與高中階段教育分流之關聯。《教育實踐與研究》，27(2)，67-98。
- 楊瑩(2014)。妥國高教機會公平性之探討。台北市：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教改20年：回顧與前瞻。247-284。
- 藍佩嘉(2014)。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臺灣社會學》，27，97-140。
- 張芳華(2015)。家庭社經地位、社會資本對高中學生教育抱負影響之分析。《教育研究學報》，49(2)，19-40。
- 張宜君、林宗弘(2015)。台灣的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維繫的不平等，《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2): 85-129。
- 葉書宏(2015)。如何養出「好學生」—台灣教育脈絡下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慣習。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雯琪(2015)。勞工階級的孩子如何成為國小教師:以屏東地區國小教師為例。屏東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 謝志龍、莊致嘉(2016)。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與轉換對國中學生教育成就的影響，《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1(3)，163-195。
- 李浩仲、李文傑與連賢明(2016)多「錢」入學？從政大學生組成看多元入學。《經濟論文》，44, 207-250。
- 鄭英傑(2017)。學做工還是怕做工？臺灣社會高學業成就勞動階級學生及其家長的反再製心態之分析。《教育研究集刊》，63(4)，65-100。
- 呂宗翰(2017)。逆風高飛—高學業成就勞工階級子女之學習歷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王啟仲(2018)。能K能玩：明星高中的社團活動、升學實作與青少年文化。《台灣社會學》，36，1-46。

謝宇修 (2020)。向上流動卻逐步遠離？：菁英文組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衝突。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旺德、陳伯偉、林昱瑄 (2020)。培力還是侷限？—兒少安置機構、慣習型塑與階級效應。《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2:1-55。

國外文獻：

Archer, Louise & Hiromi Yamashita (2003) “Knowing Their Limits” ? Identities, Inequalities and Inner City School Leavers’ Post-16 Aspirations.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8(1):53–69.

Archer, Louise, Sumi Hollingworth & Anna Halsall (2007) ‘University’s Not for Me, I’m a Nike Person’: Urban, Working-Class Young People’s Negotiations of ‘Style’, Identity and Educational Engagement. *Sociology* 41(2):219–37.

Archer, Louise, Jennifer DeWitt, Jonathan Osborne, Justin Dillon, Beatrice Willis & Billy Wong (2012) Science Aspirations, Capital, and Family Habitus: How Families Shape Children’s Engagement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Scienc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9(5):881–908.

Abrahams, Jessie, (2016) Honourable Mobility or Shameless Entitlement ? Habitus and Graduate Employ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8(5):625–40.

Bourdieu, Pierre (2008) *Sketch for a Self-Analy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nnolly, Paul & Healy, Julie (2004) Symbolic Violence, Locality and Social Class: The Educational and Career Aspirations of 10-11-Year-Old Boys in Belfast. *Pedagogy, Culture & Society* 12(1):15–33.

Calarco, Jessica McCrory (2014) Coached for the Classroom: Parents’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hildren’s Rep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5):1015–37.

Chin Ee Loh & Baoqi Sun (2020) Cultural capital, habitus and reading futures: middle-class adolescent students’ cultivation of reading dispositions in

- Singapor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1(2), 234-252
- Friedman, Sam (2014) The Price of the Ticket: Rethinking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Mobility. *Sociology*, 48(2):352-368
- Friedman, Sam (2015) Habitus cliv'e and the emotional imprint of social mobility *Sociological Review*, 64(1)
- Galloway, Mollie K., Jerusha Conner (2015) Perpetuating Privilege: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e of a High-Performing and High-Pressure High School. *The Educational Forum* 79(2):99–115.
- Gast, Melanie Jones (2018) “They Give Teachers a Hard Time”: Symbolic Violence and Intersections of Race and Class in Interpretations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61(2):257–75.
- Helene Aarseth, Lynne Layton, Harriet Bjerrum Nielsen (2016) Conflicts in the Habitus: The Emotional Work of Becoming Moder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4(1)
- Hamilton, Laura, Josipa Roksa & Kelly Nielsen (2018) Providing a “Leg Up”: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Opportunity Hoarding in Colleg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91(2):111–31.
- Ingram, Nicola (2009) Working-Class Boys, Educational Success and the Misrecognition of Working-Class Cultur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0(4):421-434.
- Jenkins, Richard (1992) *Pierre Bourdieu* (2nd Ed). Routledge.
- Jarness, Vegard, Willy Pedersen & Magne Paalgard Flemmen (2019) 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Children of the Bourgeoisie: Economic Capital and Its Symbolic Expressions at an Elite Business School.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0(4):1402–23.
- Jin, Jin, & Stephen J. Ball (2019) Precarious Success and the Conspiracy of Reflexivity: Questioning the ‘Habitus Transformation’ of Working-Class Students at Elite Univers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 1–16.
- Kaufman, Peter (2005) “Middle-clas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Activ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Structural Advantages.” *Sociological Forum* 20(2):245–70.

- Kehily, M. J., & Pattman, R. (2006) Middle-class struggle ? Identity-work and leisure among sixth form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7(1), 37–52.
- Keane, Elaine (2011) Distancing to self-protect: the perpetuation of ine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socio-relational dis/engage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2 (3), 449–466.
- Lareau, Annette (1987)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0(2):73.
- Lareau, Annette (2000) *Home Advantage*(2nd ed). Lanham,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Lareau, Annette (2002)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5):747.
- Lareau, Annette & Elliot B Weininger (2003) Cultur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ory and Society* 32(5):105-144
- Lareau, Annette, Shani Adia Evans & April Yee (2016) The Rules of the Game and the Uncertain Transmission of Advantage: Middle-Class Parents' Search for an Urban Kindergarte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9(4):279–99.
- Lareau, Annette, Curl, Heather & Wu, Tina (2018) Cultural Conflict: The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Dispositions Among the Upwardly Mobile. *Sociological Forum*, 33(4)
- Lehmann, Wolfgang (2009) University as Vocational Education: Working-class Students' Expectations for Univers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0(2):137–49.
- Prieur, Annick & Savage, Mike (2013) Emerging Forms of Cultural Capital. *European Societies*, 15(2):246-267.
- Reay, Diane & Lucey, Helen (2002) Carrying the Beacon of Excellence: Social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Anxiety at a Time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7(3):321–36.

- Reay, Diane & Lucey, Helen (2003) The Limits of 'Choice': Children and Inner City Schooling. *Sociology* 37(1):121–42.
- Reay, Diane (2004a)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apital: The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Trends in Education Policies. *Cultural Trends* 13(2):73–86.
- Reay, Diane (2004b) Stigmatised choices: Social class, social exclusion and secondary school markets in the inner city. *Pedagogy, Culture & Society*, 12(1):35-51
- Reay, Diane (2005) Doing the Dirty Work of Social Class ? Mothers' Work in Support of Their Children's Schooling.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3(2_suppl):104–15.
- Reay, Diane, Gill Crozier & John Clayton (2009) 'Strangers in Paradise' ? : 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Elite Universities. *Sociology* 43(6):1103–21.
- Reay, Diane (2015) Habitus and the Psychosocial: Bourdieu with Feelings.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45(1):9–23.
- Rachel Thomson, Sheila Henderson & Janet Holland (2003) Making the Most of What You've Got ? Resources, Values and Inequalities in Young Women's Transitions to Adulthood. *Educational Review* 55(1):33–46.
- Strauss, Anselm & Corbin, Juliet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2nd ed). Sage Publications, Inc.
- Savage, Mike , Alan Warde & Fiona Devine (2005) Capitals, Assets, and Resources: Some Critical Issu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6(1):31–47.
- Sayer, Andrew (2008) , 陳妙芬、萬毓澤譯, 《階級的道德意義》。台北：巨流。
- Sherman, Rachel (2017) Conflicted Cultivation: Parenting, Privilege, and Moral Worth in Wealthy New York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5(1–2):1–33.
- Scherer, Mary L. (2020) Unequally Adrift: How Social Class and College Context Shape Students' Mentorship Experiences. *Sociological Forum* 35(3):744–64.

Willis, Paul (1977)*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eis, L. and Cipollone, K. (2013) 'Class work': Producing privilege and social mobility in elite US secondary schoo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4(5–6), 701–722.



附錄：訪綱

(一)、個人升學史：

1. 家裡有幾個人？你在家中排行第幾？能不能介紹一下家裡的成員？
2. 家（族）裡有沒有兄弟姊妹也唸大學？
3. 父母從事什麼行業？最高學歷？
4. 學習處境：
 - 4.1 以前唸書的環境（學校、家裡）是怎麼樣的？
 - 4.2 小時候原本就有興趣唸書嗎？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唸書的習慣？怎麼培養？爸媽平時會陪你讀書？
 - 4.3 爸媽從小的教育方式是怎樣？你覺得爸媽會不會很重視你會不會唸書？平時會怎麼鼓勵你？
 - 4.4 以前小時候唸書需不需要擔心學費？要補習容不容易？有申請補助或獎學金的經驗？申請補助的條件是什麼？
 - 4.5 有哪些朋友在你成長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爸媽會去學校拜訪老師嗎？爸媽很重視老師的意見嗎？在你升學過程中遭遇困難時，有沒有遇到過貴人提供你建議或協助？
 - 4.6 選學校的時候，家裡通常都是誰意見最多？誰有決定權？老師有給過你什麼建議嗎？
5. 有沒有高中同學或朋友一起上大學？
6. 上____大學算是自己計劃的一部份嗎？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比較具體的想法？
7. 除了____系，有考慮過其他選擇嗎？有沒有想過去唸普通一點的大學？
8. 你認為，如果過去的自己沒有做對哪些決定，或忽略了哪些重要的建議或協助，今天可能就無法唸到大學？
9. 你覺得家庭給你最大的協助是什麼？

(二)、成為大學生：

1. 能不能請你分享一下，剛到學校第一年的情況？有什麼最令你印象深刻的

事情？

2. 目前平常一到五都是怎麼安排的？有哪些主要的活動？有在打工嗎？
3. 會怎麼利用假日？
4. 住宿狀況（怎麼找、選擇的原因）？
5. 校園的社會關係（同儕、老師）—
 - 5.1 班上同學除了課業，最常談論的共同話題前三名有哪些？
 - 5.2 如果讓你分類，你認為班上的同學可分成哪幾種人？
 - 5.3 有哪些人是你想接觸認識的？哪些人是你不想親近的？為什麼？
 - 5.4 你認為進入大學之後，懂得怎麼社交和與人交流很重要嗎？為什麼？
 - 5.5 對你來說，社交最困難的是什麼？
 - 5.6 身邊最常接觸的同學有哪些？一開始是怎麼認識的？平常會一起幹嘛？
 - 5.7 有想過嘗試打破同溫層，去參加平常不會參加的聚會，跟背景不同的同學交朋友嗎？
 - 5.8 會想要跟老師混熟嗎？為什麼？
 - 5.9 有沒有想過，以後出國的話要找誰寫推薦函？為什麼？
 - 5.10 跟老師有沒有過什麼不愉快的經驗？
 - 5.11 需要一些認真建議的時候，會想找老師聊嗎？老師通常都怎麼回應你？你認為這樣的對談，對你有什麼幫助？能否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 5.12 在學校裡面，有沒有過什麼經驗或困難感覺是其他人很難理解，或是不知道可以找誰聊的？
 - 5.13 曾經有過校內輔導的經驗嗎？當時是什麼原因尋求這方面的資源協助？
6. 自我學習—
 - 6.1 你覺得在大學的唸書方式跟以前（國高中時期）比起來有什麼差別？
 - 6.2 在班上，你認為自己具備哪些特質是其他同學沒有的？還有哪些是自己特別弱、很難克服的致命傷？這些不足主要影響你的是什麼？
 - 6.3 課業方面，老師在課堂上的要求好不好應付？有沒有覺得跟不上或挫

折很大的時候（你認為這跟你的致命傷有關嗎）？

- 6.4 你會如何應對學業上的難題？有試過哪些方法和訣竅？
- 6.5 你同意上大學能開拓一個人的視野嗎？為什麼？你的經驗呢？
- 6.6 身為一名大學生，你會怎麼定義「學習」？你認為「學習」應該包括哪些事情？
- 6.7 目前對自己有什麼規劃和期許？
- 6.8 上大學之後，有沒有培養什麼新的興趣或休閒？能不能分享一下最初是怎麼投入的？

7. 談吐、穿著和品味－

- 7.1 跟人相處的時候，最怕自己犯什麼錯誤？為什麼？能否舉一個實例？
- 7.2 你希望自己給人營造的印象是什麼？為什麼？
- 7.3 國高中的時候會在意外貌或打扮嗎？當時會怎麼弄？
- 7.4 上大學之後，有沒有嘗試改變自己的形象（例如髮型、穿著、身材等）讓自己加分？
- 7.5 會不會覺得找到適合自己的形象很不容易？為什麼？
- 7.6 在學校很多場合都要說話表達，會不會給你很大的壓力？
- 7.7 你認為說話最困難的是什麼？你會怎麼訓練和要求自己？
- 7.8 如果按照重要的程度排列，談吐、外貌、學識，你的順序會是？為什麼？

8. 很多人都覺得大學階段所經歷的變化最大，以你自己來說，哪些改變最令你印象深刻？

（三）、個人生涯：

1. 視野－

- 1.1 以前的朋友現在還會保持聯絡嗎？他們現在都過得怎樣？
- 1.2 最近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見面的時候都聊什麼？
- 1.3 會不會羨慕他們之中有些人很早就有自己人生的定位，甚至成家立業，比起他們的人生選擇，有沒有想過自己幹嘛那麼辛苦？
- 1.4 不同的學經歷，有時候會不會影響你們對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曾經因為

類似的情況有過不愉快嗎？

- 1.5 長大之後，還會參與家裡的活動？例如幫忙家中雜務、逢年過節拜拜、出遊等？
 - 1.6 會不會覺得在家裡很多事情必須配合家人，有時很難維持自己生活上的要求和習慣？
 - 1.7 上大學之後，最常因為什麼事情跟家人吵架？你覺得主要的問題出在哪裡？能否舉一個實例？
 - 1.8 有沒有跟家人或朋友討論過未來的規劃？他們的看法你都認同嗎？有沒有很挫折的時候？
2. 觀念繼承—
- 2.1 經歷了那麼多，你也提到過去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改變，但，你認為這些改變會讓你變得不再是你自己嗎？你會怎麼看待這個全新的自己？
 - 2.2 父母從小給你的觀念中，有沒有哪些是過去你很不能理解，但今天卻覺得很受用的？
 - 2.3 畢業後會想離開家裡，去不一樣的地方生活看看嗎？為什麼？
 - 2.4 你認為怎樣對自己負責，才是給父母親最好的交代？
3. 你期待在下一個十年之後，自己會在哪裡？過怎樣的生活？